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12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12月

目 录

| | |
|---|----|
| 本期导读 | 01 |
| 学术聚焦 | 02 |
| 【重大报告精要】中国的健康老龄化之路 赵耀辉 | 02 |
| 阿尔茨海默症对健康老龄化影响巨大 贾建平 | 08 |
| 老年健康研究需要新视角和新模式 詹思延 | 09 |
| 长护险的真实效用和必要改革 封进 | 11 |
| 分级诊疗的激励机制需要重构 王震 | 14 |
| 实现健康老龄化，务必用对社会经济政策 John Giles..... | 16 |
| 老人偏爱居家养老 养老供给侧亟需转型 雷晓燕 | 19 |
| 应对老龄化，中国需要哪些社会经济政策 赵耀辉 | 21 |
| 养老机构面临必要的调整 陈欣欣..... | 23 |
| 月度精选 | 25 |
| 尊重常识是战胜经济挑战的前提 姚洋 | 25 |
| 【对话】美联储是否会持续紧缩？中美关系如何求同存异？ 罗伯特·鲁宾、黄益平 ... | 29 |
| 疫情期经济增长特点与成因思考 卢锋 | 33 |
| 个人养老金业务将加快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 沈绍炜、黄卓 | 40 |
| 疫情下的消费与资产价格变动特征 赵波 | 44 |
| 学院资讯 | 48 |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2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2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主要内容仍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部分。

“学术聚焦”的内容来自我们11月21日举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重大报告”由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联合国内外三十位学者历时四年完成，特邀北京大学、《柳叶刀》杂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多家机构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活动由北京大学和《柳叶刀》杂志联合主办，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组承办。赵耀辉教授代表课题组介绍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教授贾建平、北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思延、复旦大学

公共经济系主任封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震、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 John Giles、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雷晓燕，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员陈欣欣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请点击阅读[报告全文](#)，或参阅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号的发布。

本期“月度精选”包含五篇文章，分别是姚洋教授在其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所作的主题分享，黄益平教授与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对话，卢锋教授对于疫情期经济增长特点与成因的思考，黄卓副教授和沈绍炜博士对于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的分析，以及赵波副教授对于疫情下消费与资产价格变动特征的论述。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12月30日



【重大报告精要】中国的健康老龄化之路¹

赵耀辉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以下简称《重大报告》）集合了我们团队30多位专家之力。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报告背景（第一章）

目前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寿命不断增长，出生率不断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目前还不是世界最高，但很快会成为世界最高。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或者说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仅会超过美国、英国和德国，还会逼近日本。我国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老的国家”之一。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2020年到2050年的三十年间，我国人口形势会发生很大变化。60岁以下所有年龄段人群的数量都会净减少，二三十岁年龄段人口会减少30-40%，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有较大涨幅，特别是高龄老人，即

80岁以上人口数量上涨幅度最快。从1990年到2050年，我国八十岁以上人口数量可能达到以前的16倍，这意味着我国很快就会面临较大的养老负担。印度人口总数即将超越中国，然而我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远比印度多。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约为4亿，印度只有2.5亿，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人口负担比印度大很多。

二、核心结论：“健康老龄化”是关键

这样一种老龄化趋势将对我国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老年人多意味着支出要增加，年轻人数量少意味着贡献给社会保障体系的钱会变少。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保体系或许会出现赤字，随后蔓延到财政体系，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意大利、希腊、德国等都是财政负债率较高的国家。由此可见，一国老龄化程度和财政负债率不仅相关，很大程度上构成因果。

1. 本文根据赵耀辉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译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第二，老龄化必然要求更多照料，可能会引发照料压力。目前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能在老人身边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员数量可能减少，照料赤字或将发生，需要照料的人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上述老龄化挑战的应对之道就是“健康老龄化”，《柳叶刀》主编 Richard Horton 博士提到，美国医学院的大报告也持同样观点。

健康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健康地增长，即增长出来的寿命大部分是健康的，失能的情况变少。与此同时，健康老龄化也是延迟退休的基本保障，老年人只有身体健康才能一直工作，才能减少医疗服务支出和照料需求，长寿才能变成红利，而不是负担。对经济而言，如果应对得当，长寿反而能变成一种红利，这是好事。

三、报告的章节划分

健康老龄化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一些条件。要实现健康老龄化，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健康的决定因素，使之成为政策的发力点。在总结目前的医疗卫生和照料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这份《重大报告》分五大章节，第一章是报告的时代背景，第二章是老年人目前的健康状况和变动趋势，第三章是老年人健康的决定因素，第四章是医疗和照料方面的相关政策，最后一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接下来，我将向大家逐一介绍《重大报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第二章：老年人健康状况和趋势

在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这一章，我们主要回顾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变动趋势。我们收集了截至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文献，也补充了一些相关数据，主要涉及几个方面：预期寿命和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和传染病的状况，精神卫生

和认知健康，日常活动自理能力和照料负担，以及主观幸福感和其他相关疾病情况。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在健康领域也有充分体现。传染病逐步减少，慢性病得到有效防控，这些都使我国人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因此，我国人民的疾病谱在1990-2010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慢性病为主。慢性病覆盖了很多的领域，我们邀请各领域的专家，针对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脑卒中、慢性肾病、慢阻肺、肿瘤等多种慢性病的演变过程做出回顾，这些内容都在《重大报告》中得到体现。

在回顾过程中，我们对疾病的变动趋势非常关注。疾病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政策以及政策落实的优先级就要跟上。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相关数据非常少且难以获得。有些数据仅源自医生的诊断。中国有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不看病，即使患病自己也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一些数据中体现出的变化趋势很可能不准确。还有一些关于中风、癌症等疾病的数据很难获取，我们的调查研究也因此遇到不少困难。

尽管如此，我们仍取得了许多进展和突破。一些基于客观测量得到的数据，以及与久坐和热量摄入过多有关的慢性病，比如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真实的上升趋势。这些疾病在城镇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发病率，这也和城镇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恰好相反。在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较低。我国的情况肯定要经历一个过程才会出现拐点，至于何时出现拐点，我们不得而知。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高知女性或将优先引领这个趋势，当然这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与吸烟等环境暴露相关的疾病的患病率，比如慢阻肺、肺癌等，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与我国几十年来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有关。



还有一些疾病，比如抑郁症、痴呆和认知功能障碍等，我们尚不清楚其病因、上升趋势以及何时能够迎来拐点。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综合相关数据得出一项结果——近年来我国老人的失能率有所下降。日常的生活能力是人民健康指标的综合体现，我们的研究主要参考了吃饭、如厕、起床、购物、服药等反映基本生活能力的指标，结果发现老年人失能情况的确有所下降，这让我们很受鼓舞。

尽管慢性病的发病率日见增长，但其他方面疾病的发病率已经下降。除了失能，还有诸如衰弱、肌少症、跌倒骨折、自报疼痛、自报感官失能、牙齿缺失等老年常见问题，以及主观幸福、生活质量等，这些维度在《重大报告》中均有所涉及。

报告第三章：影响老年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第三章，我们回顾了国内外文献关于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认为，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 胎儿期和儿童期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整个生命期健康的决定性因素；
2. 健康行为，比如吸烟、饮酒、体力活动、饮食和营养等，我们都一一回顾并做出综述；
3. 社会环境，包括社交活动、老年歧视、老年虐待以及物理居住环境等。

我们认为人在童年期甚至胎儿期的经历对其一生健康的影响在老年期会进一步体现出来。比如在母亲胎盘内或儿童期缺乏营养，受教育程度低，儿童期居住环境差以及缺少父母照料等因素，都可能对人的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健康的儿童成年后，其健康状况也会不错。

健康行为方面，我们主要聚焦吸烟这件事的影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男性吸烟率高，女性吸烟率低。从年龄看，20多岁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最容易养成吸烟的习惯。一旦步入老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顾忌健康而选择戒烟。此外，一个人吸烟与否和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

育程度越高，吸烟率越低。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吸烟率也会在未来自动步入下降通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躺平”，在禁烟方面，我们还需做出更多努力。

很多已有文献都认为，社交活动有助于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抑郁症发病风险和失能风险，提高认知功能、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在传统文化的认知中，中国人讲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一个家庭就是一张社会网。时至今日，这一情况已经发生较大改变。今天75岁以上的中国人，人均拥有4位健在子女；50岁以上的中国人人均仅有2位健在子女。这意味着老年人若想开展社交，需要更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空巢老人”，还有大量的“京漂”“沪漂”老人，这些客观因素对老年人社交已经构成挑战。

疫情也限制了线下社交，线上社交在这几年异军突起，成为重要替代。对于那些子女在外地工作的老人，线上社交是一种维系社交联系的重要方式。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年纪越大的人使用网络的频率越低，居住在城镇的人使用网络的频率比居住在农村的人要高。从2011年到2018年，城镇老年人口使用网络的频率和情况大为改善，但农村老年人网络使用情况改进则相对有限。这说明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切实存在且非常明显。

居住环境方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人步入老年，居住环境的质量对其健康影响巨大，年龄越大越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下大力气治理环境，这与老年人的健康关系密切。

报告第四章：老年健康与照料的有关政策

第四章主要讨论与老年健康相关的促进政策和照料政策。近年来，我国在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初级保健和分级诊疗体系、老年医学、安宁疗护、长期照护体系、长期护理保险和医养结合等发面都取了较大进展。

报告第五章：健康老龄化的路径建议

在第五章，我们针对中国健康老龄化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提出生命周期视角。

许多中外文献均已强有力地说明，个人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临床医学发挥的作用仅是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关注老年人健康不能仅局限于医学领域，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着眼，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健康。我们还可以通过缩小不同人群间经济差异来缩小健康差异，这一途径同样值得重视。此外，老年人健康中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因素同样显著，无论从哪个维度上看，这些差异都切实存在且区别明显。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和加强儿童营养，提高儿童期的医疗卫生服务，尽可能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强化健康素养教育。

此外，消除不同群体间的隔阂，让流动人口实现与本地人口均等化的服务，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针对青少年，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大控烟力度，让这部分人尽可能远离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家庭和社区环境对于老年人维持身体机能和基本活动能力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老年人已经罹患某种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客观环境，提升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倘若患病后的老年人仍可以自己做饭、外出和活动，这对维持其认知和身体活动功能而言非常重要。

在我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人们大都居住在高层公寓里。当初建造这些高层公寓时，老龄化问题尚未凸显，设计者和建造者也没有考虑居住者年迈后的出行问题。我国政府目前正在推动针对老旧住宅的改造工程，计划为这些老旧住宅加装无障碍设施或是电梯。政府大力推动，但这项工作仍遇到很多困难，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

第三，提倡医疗遵循老年人的特点，以老年人为本。

老年人大多罹患多种疾病，多病共存。我们目前的医学体系是专科诊疗，这与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全科医学综合性服务，除了“医身”，更需要“医心”，把老年人的躯体和精神功能维护好。相比治愈疾病，维护好老年人的功能，令其能够自理更为重要。目前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有意识地加强老年医学、康复医学和安宁疗护学科的人才培养。

第四，强化医疗服务监管。

近年来，随着收入上涨，医疗保险普及，报销率不断提升，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有了很大增长。尽管我国医疗服务供应扩张迅速，但仍有部分医疗服务的供给存在缺口。其中，老年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医疗服务一旦出现缺口，老年人可能是最容易被排除在外的群体。

随着医疗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骗保行为也屡见不鲜。骗保实际上限制了我国开放医疗服务的进程，大家总会担心新势力入局，可能会让医疗保险体系受到损失。因此国家应下大力气强化保险公司甄别骗保欺诈行为的能力，积极借鉴国际上相对成熟的甄别技术和经验。一旦保险公司拥有了一双“慧眼”，骗保行为或不再会是限制医疗服务扩张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应大力降低机构准入门槛，鼓励这些机构优先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现有的大型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服务的动力不足，政府可以鼓励社区服务卫生中心这类机构，通过一些政策倾斜来提升它们服务老年人的积极性。与大医院相比，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具备地理上的优势，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入门入户服务。针对这些机构的激励体系，国家应该花大力气好好设计。

互联网医疗服务也是具有很大潜力的一个选项，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具有很大价值。目前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管制相对较严，未来可以考虑适



当放松管制。

第五，建设全国统筹的医疗保险体系。

我国医疗保险非常碎片化，甚至同省不同市的医疗保险相互之间也不打通。这种碎片化的情况不利于风险分摊，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也阻碍人口流动。很多希望到子女居住地养老的老年人，最终因为医疗保险报销率低或报销困难而未能如愿。目前国家花了很大力气建立医保异地结算体系，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这一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因此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全国统筹的医保体制。

建立全国统筹医保体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医保结余多的地方当然不愿与医保赤字地区相互统筹。平心而论，医保赤字地区不该为这些赤字背锅，因为之所以会产生赤字，主要因为这些地区不断向外地输送劳动力，留下的只是年老有病的人。因此，只有国家出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全国统筹才可能实现。

第六，政府应帮助家庭落实老年人照料。

针对老年照料，我国已提出 9073 模式，有些地区是 9064 模式，即 90% 的老年人照料通过家庭实现，6%、7% 通过社区实现，剩下的一小部分通过养老机构来实现。我国的这一方案与国际上流行的方案基本一致，即便是那些高收入国家，90% 的老年人照料也是通过家庭实现。这意味着家庭仍是照料老人的主力，政府也应该出台更多帮扶家庭的政策。

我们要着力消除阻碍父母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让父母愿意并且能够迁居到成人子女居住的地方。毕竟让成年子女迁回老家难度太大，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牺牲。家庭照料可能给照料者的身心带来伤害，老年痴呆症的照料者尤其如此。政府应协助社区机构或网络平台，向照料者提供技能培训或者是“喘息服务”，以此减轻他们的负担。

第七，老年照料机构的管理。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养老机构发展，新的养老机构层出不穷。一方面新建的养老机构空置率很高，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失衡的状态。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让市场来发挥作用，让市场来决定政府支持的流向。政府补贴也应该从补贴供给方变为补贴需求方。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拿到政府补贴后，自己到市场上寻找合适的服务供应商。这样可以在各个医疗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更好地分配资源，因为只有需要照料的家人才知道哪种机构更能满足需要。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养老机构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严格的消防规定，这已经成为该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很多养老机构因无法满足消防规定而面临倒闭。我们建议政府应采取机构责任险等方式，降低养老机构的消防风险，帮助这些机构“达标”。

第八，长期护理保险。

目前我国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这些试点都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困难。

1. 筹资渠道不可持续。长期护理保险一般由现有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现收现付，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从医疗保险基金拿钱，因此长期护理保险将来可能对医疗保险基金形成挤占。

2. 现收现付的模式不利于抵御未来老龄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3. 医疗保险基金由地方统筹，资金池子小，不流于人口流动。本地老人迁居外地就无法享受长期护理保险。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 设立独立筹资渠道，不与社保、职工医保或是居民医保绑到一起。

2. 引入个人账户，替代现收现付。年轻人可

以从年轻时就为自己攒钱,年老时再拿出来使用。

3. 对长期护理保险实行统筹管理,避免碎片化的管理阻碍老年人享受这项服务。

第九,重新规划退休政策。

除了健康老龄化,我们还应激发老龄化过程中的新增潜能。目前城镇女性 55 岁就退休,当年制定这一标准时,中国人的寿命只有 40 多岁,

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已提高至 80 多岁,55 岁退休的标准显然已不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当然也有许多女性乐意在 55 岁时选择退休,她们可能已经做了奶奶或姥姥,也可能需要退休在家照顾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建议增加老年照料和儿童托育的社会化服务,以此激发中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积极性,挖掘老龄化社会的新增潜能。



阿尔茨海默症对健康老龄化影响巨大²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教授

我主要从事老龄化代表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症和相关痴呆症研究，今天讲一讲痴呆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中国有 3800 万老人患有认知障碍

目前，中国老年人已占据全球老人的 25.6%，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痴呆病症对健康老龄化已经构成很大的威胁。

2014 年，中国有 3000 多万人具有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2020 年，这一数量进一步攀升，中国的痴呆患者多达 1500 多万，还有 3800 多万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他们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其次是北方地区，长江以南最少。

在中国，每个痴呆患者每年的花费是 12 万元人民币，中国每年用于痴呆患者的治疗费用高达 1.1 万亿人民币，不仅影响老人自己的生活质量，给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财政都造成巨大的负担。

是否干预，区别明显

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开展健康老龄化？我们发现了九个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分别是：农村居住、受教育时间短、丧偶或离异或独自生活、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

我们有一个围绕健康老年人的记忆保护课题，

针对 29000 位老人开展了长达十年的随访调研，发现生活方式最好的老人，其记忆下降速度要明显慢于最差生活方式的老人。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确可以有效保护老年人的记忆。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对中国近三万老人的 14 个痴呆危险因素进行了预防。14 个影响痴呆症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健康饮食、低频率太极、缺乏锻炼、认知活动少、缺少社交、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血管疾病、超重 / 肥胖、低教育程度、吸烟、饮酒和抑郁。我们发现，十年下来如果以上危险因素控制得好，就会有明显的防痴呆作用。

CVD（脑血管疾病）是痴呆最强的危险因素，通过危险因素的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痴呆病症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这说明遗传的危险因素也可以被生活方式的控制所抵消。

政策建议

最后，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老年认知障碍与健康老龄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多关注老年人认知障碍体系的建设、养老体系的建设，减少老年认知障碍和相关疾病。

第二，由于社会对老年认知障碍的歧视和污名化，严重影响了患者人群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以消除这种病耻感、污名化以及歧视，是摆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老年人才会有更幸福感。

2.本文根据贾建平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老年健康研究需要新视角和新模式³

詹思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今天我想从流行病学病因模型的角度来探讨我国老年健康的路径。

一直以来，我国都面临着双重疾病负担的问题，老年人尤其如此。慢性病威胁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对现有劳动力也构成威胁，耗费了大量的国家医疗资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慢性病威胁叠加传染病威胁，老年人共病和多发病问题更加凸显，本身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在疫情面前更显脆弱。随着病程发展，传染病也将逐步慢性化，最终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

随着对健康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不断探索老年健康的路径。开始时，我们主要关注躯体健康，此后逐步开始重视心理健康，到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人类的生态健康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发现个人健康不仅受到个体影响，还与家庭、生活方式、城市体系、工作、个人时间等各种因素都密切相关。

全生命历程的新视角

今天我们提出健康干预，主要也是从这些与健康相关的点位入手。在《北大-柳叶刀：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重大报告》的第三部分，特别提到威胁老年健康的许多因素，大部分都包含在生态健康模型中。令人惊喜的是，这份报告特别提到胚胎期的经历对健康的影响。这与流行病学目

前流行的一个新概念——空间全生命周期流行病学的理念不谋而合。事实上老年期的疾病，其病因或许和胚胎期乃至整个生命历程中各种暴露的积累有关，想要解决老年期的健康问题，我们还需要向前追溯。

“十一五”时期，我们曾做过脑卒中的社区预防，主要聚焦导致脑卒中的因素，并将其分类。比如哪些因素可以控制？哪些是最直接的危险因素？哪些可以通过药物控制？哪些可以通过非药物手段加以预防？这些在这份《重大报告》里都有提及。然而同样的预防手段，对一些人有用，对另一些人则没用，因此我们也考虑将遗传因素、各个组学层面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是近几年流行病学领域最新提出的系统流行病学理念和研究方法。通过这样的方式，精准预防和精准干预就会更扎实地落地。

研究数据和结果共享的新模式

在研究中，队列是获得每一个证据链条里相关证据的重要基础。在这一领域，我国早已展开相关布局，李立明教授牵头的CKB（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队列已经有18年的随访历史，获取了250多万生物标本，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CKB对我们生活方式中的危险因素

3. 本文根据詹思延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译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以及生理和病理因素都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仍有很多问题待解。

在我看来，仅有CKB可能还不够。目前我国拥有如此多的队列，这些队列还无法共享。如果共享原始数据存在一定困难，我们能否通过结果共享的方式整合这些队列？这样做能更好地回答健康链条上的每一步，对于搭建我国自己的队列共享平台也大有裨益。

2017年10月我们牵头搭建了中国队列共享平台（China Cohort Consortium），目前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44个队列信息。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结果层面的数据合并，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合作的路径，也特别希望能在未来取得进展。要研究整个老年全生命历程，横纵结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衷心希望能与所有的队列一起合作，做好这一领域的循证工作。

长护险的真实效用和必要改革⁴

封进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

今天主要分享我们关于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的老人主要还是由家人在长期照顾。CHARLS 2020 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5% 的老人完全由保姆照顾或者其它家政服务来照顾。调查结果还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中有 17.8% 的人患有至少一项 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日常生活活动）或 IADL（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功能性日常生活活动）失能。此外，在我国的家庭养老模式中，承担照顾责任的主要是老人的配偶，而这些配偶患有抑郁症、疼痛症状或者其它慢性病的风险很高。

长护险的两个必要调整

我国从 2016 年开始启动“长护险”制度试点工作，到 2020 年底，试点已覆盖 49 个城市。整体来看，居家医疗护理“长护险”的受益人占 61%，机构医疗护理“长护险”的受益人占 39%。但不同城市的差别很大，比如上海居家医疗护理“长护险”的受益人占到 83%。

《北大 - 柳叶刀：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重大报告》研究报告分析了 2016 年第一批 15 个试点城市“长护险”制度的实施情况。最后得出的

政策建议是，建立强制性的以社会保险为主要运行模式的“长护险”制度，同时建立独立的“长护险”险种。

报告指出，目前各地“长护险”制度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有的老人退休后去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养老，但由于参保地和申领地不一致，导致无法享受“长护险”待遇。报告因此建议，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长护险”账户，累积在不同地区的缴费，实现异地报销。

报告还提出，希望政府的养老补贴从补贴供给方转向补贴需求方，如通过发放服务券等加强供给市场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

要减轻配偶长期独自照护的压力

利用 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对比了 2011 年和 2015 年家庭照顾者身份的变化。结果显示，照顾者为配偶的比例从 2011 年的 51% 上升到 2015 年的 54%，照顾者同时为配偶和孩子或配偶和保姆的比例也在增加，而照顾者仅为子女或仅为保姆的比例在下降。调查发现，15% 至 16% 的老人没有任何人来照顾，而他们至少患有一项 ADL 和 IADL 失能。

结果显示，照顾老人会影响到配偶自身健康，

4. 本文根据封进教授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特别是女性配偶所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大多数家庭中都是妻子在照顾失能的丈夫，所以女性配偶患有抑郁症或者身体出现疼痛的可能性更高。

在家庭照顾中，由配偶照顾老人的情况又分两种，一种是子女或者保姆可以帮忙一起照顾，另一种是全靠配偶一个人来照顾。调查结果显示，前一种情况对配偶的健康影响不大，但后一种情况导致配偶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

可见，那些独自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女性，其身体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长护险”制度就可以帮助她们减少家庭照顾的负担。

“长护险”的城乡差距和对医保基金的影响

首先，“长护险”对不同参保人员的健康影响不同。“长护险”的参保人员有两类，一类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另一类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采用某试点城市的实际运行数据可以看到，失能患者在被评估为同等级的失能状况下，参加了“长护险”的患者在失能等级评估后第二年的死亡率要远远低于未参保者，即“长护险”明显降低了失能患者的死亡率。

但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从“长护险”中的受益比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更少，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低。我国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主要为农村居民，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主要是城镇居民。因此，即便大家都购买了“长护险”，由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健康差距仍然存在。

其次，“长护险”对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的影响。数据显示，“长护险”可以减少医院的“压床”（不必要的住院）现象，使得人均年度住院费用下降了2981.8人民币，但是“长护险”人均年度报销支出达4937.8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人均年度医疗总费用增加了2739元人民币。这

些数据来自试点城市的“长护险”实际报销金额，因此比对医疗费用的调查数据更加准确。

由于目前“长护险”依附于医保基金，而退休人员不用再缴纳医保，因此“长护险”给医保基金造成的压力将不利于“长护险”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调查显示，当配偶在照顾居家老人时，如果有家人或保姆来一起分担，则配偶的健康状况会明显改善。因此，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如为老人提供日间护理、食堂和康复设施等社区养老服务，将非常有价值。

目前，政府也非常重视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北大-柳叶刀报告中有一个案例，是民政部于2000年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星光计划”。当时“星光计划”投入上百亿资金修建了几十万个农村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等，但该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和需求不匹配。

因此，在政府提供养老补贴时，建议把一些服务项目外包给私人非盈利机构来运营，这样有助于供给和需求更加匹配，同时效率更高。现在大部分城市已经开展了由政府 and 私营机构合建的养老机构。

第二，提高“长护险”基金的使用效率。“长护险”在待遇设置上应该更倾向于失能程度较重且伴有多种慢性病的老人，以及那些低收入或无人照顾的“脆弱”老人。

目前，影响“长护险”基金使用的因素有：

1. 收入制约长护服务的使用，比如收入较低，但失能程度较高的老人目前长护险提供的待遇仍然不足；
2. 信息不对称带来长护险基金浪费，包括提供服务的真实性、服务范围或者服务质量方面都存在不规范问题，而要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又非

常困难，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来监督服务提供和使用。

第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制度。只有当“长护险”可以实现异地报销后，那些去外地养老的老人才能享受到“长护险”待遇，这是我国“长护险”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不同地区、城乡差异造成各地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供给

能力存在巨大差距，未来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新一轮试点的方向已明确，只针对城镇职工参保人员。新一轮试点将进一步在服务供给能力可及的人群中展开，以更好地总结实施“长护险”制度的经验。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期待“长护险”制度未来更加公平统一。



分级诊疗的激励机制需要重构⁵

王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由北大国发院赵耀辉教授领衔和《柳叶刀》共同完成的这项关于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的重大报告，我突出的体会是两点：

第一，推动健康老龄化十分重要。报告针对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性证据。我的理解是，健康老龄化是通过减少老年人的失能、残障，通过控制慢性疾病等实现对老年疾病的压缩，减少老年人的痛苦和家庭、社会负担。报告也对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路径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第二，公共政策转型。在报告指出的健康老龄化的推进路径中，除了医学技术进步，很关键的一点是优化公共政策，特别是生活方式、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转型是报告的重要逻辑线索。实现需健康老龄化，公共政策需要及时转型，由之前以“治疗疾病”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转型为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政策体系。报告也分析了政策转型背后的原因，包括疾病谱的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主要致病原因等。要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型到以健康为中心，政策上就要凸显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性。以健康为中心，建设一个高效率且富有弹性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整个公共政策转型的逻辑线索。

“分级诊疗”的激励机制有问题

过去十年，我国在推动社区医疗卫生发展方

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投入了大量资源，形成了以分级诊疗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分级诊疗”在过去十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是一个中心政策术语，多次被作为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主题，在政策文本当中也占据了很大部分的篇幅。最高领导层对分级诊疗也寄予了厚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分级诊疗政策的详细内容和来龙去脉不再赘述，报告里有详细解释。在实际推动分级诊疗的过程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包括财政资金、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源等，但政策效果不尽人意。大城市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住院率高居不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可罗雀，就诊人次占比十年来一直持续下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硬件投入不断增加，但相比于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居民的吸引力仍然在持续下降。

从宏观数据来看，我们从2010年启动医改到2019年，整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人次占比竟然下降10个百分点，而大医院的占比却在同期快速上升。

数据显示，职工医保的住院率一直呈陡峭上升状态，2019年达到19%，赶上国际水平。在东亚文化圈中，比如中国台湾省的住院率不到10%。实证研究也表明，我们存在大量低标准、无效率的住院，由此带来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投了钱和人，政策上也有明确方向，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背后的激励机制错配：医院在强激励机制下，有扩大规模、扩大住院、过度诊疗的冲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5. 本文根据王震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在弱激励机制下，没有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微观经济学第一课讲的经济学十大原理就强调了激励的重要性。我们的大医院是非常典型的强激励制度，即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完全依赖于诊疗多少病人，开具多少药物，安排多少人住院。强激励制度有效调动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于是有种现象是“大小通吃”，比如感冒的人也去协和医院看病，协和的大专家也得空出时间来看一个小感冒，像这样的资源浪费非常普遍。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是典型的弱激励机制，收支分为两条线，即医护人员的个人收入和工作量没多少关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无法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然而，当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希望享有更多的上门医疗服务或是医疗性初期护理服务，这就需要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积极提供有吸引力的服务，使老人愿意就近接受医疗或护理。

以健康为中心，重构激励机制

从国际比较来看，英国的公立医院建立在国家医疗服务（NHS）体系之上，也是典型的靠政府拨款的弱激励机制，但它有一个非常宽厚的GP（全科医生）系统做支撑，所以整体效率并不低。而全科医生系统以私立联合诊所或独立诊所为主，政府通过向这些机构的全科医生购买服务来为英国人民提供健康医疗服务，居民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不同的GP。这是一个强激励的机制。

相比英国，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建议以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重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激励机制，改革收支两条线，建立强激励机制；同时弱化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激励机制。我们不需要大医院的大专家诊疗普通病人，只需要他们

集中精力专研疑难重症和罕见疾病的治疗。

因此，将公共政策的重点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型到“以健康为中心”，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一目了然。

对于大医院而言，集中解决疑难重症、罕见疾病等，而这些疾病的预后结果通常而言不确定性较高，非标准化较强，难以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医院适合建立弱激励的机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则相反，面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路径清晰、明确，健康管理等工作的监督成本也较低，适合建立强激励机制。

政策建议

第一，将社区全科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我国医疗机构以公立为主。但机构“公立”不等于医生也“公立”。要激发社区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其与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关系可以是雇佣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型的契约关系。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全科医生及其团队提供管理服务；全科医生团队面向居民开展服务，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第二，实行按人付费与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打包付费方式。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资金来源包括财政、医保等多渠道，要将这些投入打包起来实现按人头与按病种相结合的付费方式。这在国际上有很成熟的方案，可以借鉴。但需要创新的是，在设计医生的薪酬激励机制方面，要以实现“居民越健康，医生越挣钱”为考核目标，而不是原来的“看病多，挣钱多”。创新薪酬激励机制，比如把患者的支付费用做一个测算，如果患者在后面年度比前面年度的医疗开支更少，就说明他更健康，医生的收入就应该随之提高。



实现健康老龄化，务必用对社会经济政策⁶

John Giles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北大-柳叶刀：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重大报告”研究项目的成员，我要祝贺赵耀辉教授团队完成了一份精彩的研究报告。感谢她的出色领导。我认为这是一份我们都可以引以为傲的报告。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团队的协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给所有共同撰写者带来了额外压力，是赵教授的乐观幽默和充沛干劲支持着我们不断前进，最终成功完成了报告。她践行了对这个项目的承诺。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层面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政策应对措施？我主要分享如下三个方面——老年人的经济福利支持，改善行为模式以改善健康状况的政策，以及体弱老年人及其看护者福利的政策。

第一，改善养老金政策：打破碎片化，提高积极性

中国不断扩大养老金覆盖人群范围，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养老金支持，这一方面的成绩斐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免受经济问题困扰。虽然有一些更广泛的研究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发现养老金的金额并不算高，不足以帮助人们脱贫，但对经济困难的独居老年人而言，这笔钱极其重要。

为此，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和城市非正式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支持。同时，提高非雇员缴纳部分的养老金比例，也许还能够减轻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经济负担，从而进一步鼓励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多缴纳养老金。中国现阶段的政策是，居民可以缴纳更多的养老金，但要激励这种做法，政府也需要相应提高给付金额，并让民众相信缴纳养老金能在未来某一时点获得收益。

目前中国存在的大问题是人口流动和养老金体系碎片化，即各省或各县市分散管理养老金的做法，这意味着个人可能无法异地领取养老金，异地转存养老金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可能会打击人们更高额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

因此，只有当养老金成为一种储蓄手段，并且能产生相对丰厚的回报，同时人们相信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可以随心支取这笔款项时，他们才会积极缴纳养老金。

第二，引导行为模式：教育与税收都重要

我们知道，要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证人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投入，这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投入。

报告明确指出，更高的教育水平与更好的老

6. 本文根据John Giles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年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一项重大发现。因此，我们急需的政策包括，抑制吸烟或烟草制品的使用，可能还包括禁止大量饮酒。报告中还强调，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而出现的生活方式管理和体重管理等新问题也值得重视。人们需要考虑制定更多的政策来抑制烟草和烟草制品的使用。大家也许会觉得这属于宏观层面的税收和监管政策，尤其是针对烟草而言。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些新的举措，利用行为科学理论帮助个人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烟草问题而言，中国为减少吸烟做了40多年的努力，但吸烟人数依旧居高不下。近年来青少年吸烟率甚至有所上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老年男性中，农村地区的吸烟率约占50%，仍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迄今为止，减少吸烟人口的措施主要是在公共场所颁布吸烟禁令，但这些禁令并不总是有效。其次，还有教育宣传和利用税收提高香烟价格。尽管对香烟征收了税费，但经济发展和购买力的增强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购买香烟的实际成本其实下降了50%以上。正如报告中所述，有效提高香烟价格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积极游说。二者是烟草生产和香烟制造的实际掌控者。他们的游说盖过了支持提高税率的声音。针对该问题的一个有效改革办法是将烟草管理与烟草行业本身相分离。

在教育方面，我们主张扩大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健康扫盲，包括对尚未接触烟草的青少年群体进行提前干预，也包括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进行干预。我们还提到了其它国家近期采取的一些措施建议，将教育宣传与提供一体化医疗措施相结合，利用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帮助和推动人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涉及针对个人的项目，或利用群体中同群效应的项目鼓励人们相互激励，以减少吸烟行为或采取其它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有实验文献提到，资金奖励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效应有时并不会长期持续。

因此，中国的研究有必要尝试不同类型的激励干预措施，以找出与教育干预相匹配的有效激励手段。

在北美和欧洲有对生活方式进行干预的手机软件，用于帮助人们管理体重。最受欢迎的是这款软件，里面包含虚拟教练、互助小组、日常饮食规划和设置健身目标等功能。这对那些希望获得支持以实现更好生活方式的人起到了鼓励作用。

因此，将宏观调控和监管以及税收效应，税收制度改革，还有教育干预和个人激励相结合，也许会对减少吸烟人口产生极大帮助。

第三，改善老弱照护：降低老人的迁徙成本，减轻照护者的负担

随着我们迈向未来，家庭成员将承担起更多的看护责任。事实上，约90%以上的体弱老年人需要家庭成员作为他们的主要看护者。从对中国经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这种安排存在将适龄成年人排除在劳动力之外的风险。这将对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不利影响，也会对更长期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会更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身上。这些人离开家乡农村和小城市也许能挣到更多的钱，但他们照料老人的负担也会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些适龄成年劳动者，要搬回老家照顾父母时所需要付出的高额成本。

有些人会说，报告只强调了提供护理的负担，而没有强调提供护理的积极效应。但我认为，这背后的出发点是人们在谈论负担时实际上谈的是生活负担。我们要如何减轻这种负担呢？直接措施包括促进社区中心的发展，打造基于平台的服务。这些服务通常可以与家庭护理互补，甚至可以帮助培训家庭成员如何照顾他们的老年亲属。这也是很重要的措施。这些服务也许无法完全取代基于家庭的护理，但希望能够增加老年人获得



护理的机会，让那些适龄工作的成年人能更轻松地继续工作，同时兼顾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

另外，在间接层面，关键是要减少家庭成员间试图就近居住的障碍。碎片化的社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不断增加着每个家庭老年人搬到成年子女所在城市居住的成本。统一管理健康医疗保险、

养老金和长期护理保险，将有利于降低一家人搬到彼此就近居住的成本。

简言之，政府最近一直在努力推动小城市和大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这些举措也许会进一步鼓励外来务工人员持续工作，提高他们供养父母的能力。

老人偏爱居家养老 养老供给侧亟需转型⁷

雷晓燕

教育部长江学者、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步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针对老龄人口的长期照护（LTC）需求增加，同时传统的家庭照护模式已不可持续，因为家庭的子女数量在减少，但人口流动性在增加，能够长期照护父母的子女不多。此外，长期照护老人让家庭成员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都非常重。

因此，国家层面近些年正在推广更加社会化的养老模式，比如“90-7-3”“90-6-4”。“90-7-3”是指，整个社会的养老模式由90%的家庭养老、7%的社区养老和3%的养老机构养老组成。其中3%的养老机构模式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来照护那些失能的、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政策最后在各地落实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有的称为“90-7-3”，也有的地方推行“90-6-4”，但整体思路都一样。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什么？发展趋势如何？供给情况又如何？供给能否满足社会所需？新型的养老模式又将面临哪些挑战？讨论完这些问题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

老人最喜欢居家养老

自2000年以来，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与养老机构床位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但是养老机构

床位的空置率也非常高，很多养老机构并没有吸引足够多的老年人入住。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从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需求展开分析。从老年人的实际居住情况来看，2005年至2018年，“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2018年为57%，较2005年65.8%的占比有所下降；“与子女就近居住”的老年人约为20%，占比基本不变；“既没有与子女同住，也没有与子女就近居住”的老年人占比上升，18年约为20%；“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占比最低，一直在3%上下。

从老年人的居住偏好来看，2005年至2018年，“愿意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2018年约为50%，较2005年占比有所下降；“愿意和子女就近居住”的老年人占比上升，2018年约为10%；“不愿和子女住在一起，也不愿与子女就近居住”的老年人占比增加，2018年超过了三分之一；“愿意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不到3%，占比非常低。“3%”这一数字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90-7-3”政策的制定不无依据。

从老年人的居住地点来看，2005年至2018年，“计划住自己家养老”的老年人在2018年超过60%；“计划住子女家养老”的老年人占比下降，2018年不到20%；“计划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占比非常低。

7.本文根据雷晓燕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综合上述统计结果，多数老年人希望住自己家养老，实际以居家方式养老还是占绝大多数。

养老院增多，但老人不太喜欢去

基于此，我们又继续来看，老人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居家服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2015）”结果发现，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居家服务依次为上门就医、做家务、康复照料、陪伴等。

为什么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去养老院？老年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去养老院呢？从调查数据发现，2014年至2018年，选择“无论如何都不去养老院”的老年人的占比从64.7%下降到了44.7%，不过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选择“需要照料的时候再去养老院”的老年人占比从15.5%增加到22.4%，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未来靠子女养老并不可靠，所以愿意去养老院接受照料的人在增加。而“当感觉孤独、需要陪伴时再去养老院”的老人占比也在激增，从1.8%增加至9.7%，这说明老年人对养老的需求不仅停留在穿衣、吃饭等日常照料方面，还包括希望有人陪伴等心理上的需求。

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印象究竟如何呢？结果发现，在回答“你了解养老院吗？”这个问题时，大部分老年人表示“不了解”；而在回答“你对养老院的印象如何？”这个问题时，大部分的老年人表示“没有好印象”。

综上，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养老模式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养老机构在增加，

但是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人并不多，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为何我国养老机构空置率整体比较高。因此，养老模式的供给如何去满足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型养老模式前景广阔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相协调的多层次养老体系。

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对养老院不了解、印象不好之外，养老院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情况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养老院一床难求，而有些养老院的床位空置率很高。

近年来，新型养老社区和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逐渐兴起。新型养老社区是专门为老年人养老打造的中高端社区，营造一种居家的氛围，同时又有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和功能，主要针对中高收入群体；嵌入式社区养老则是居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综合来看，这两种模式都能满足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又能借助社区获得相应的养老照护服务，未来应该比较有发展前景。

那么政府在各种模式的养老服务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调研中发现，不管是养老院建设还是社区层面养老服务，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提供场地和补贴等。但是，如何进行更好的制度设计，提高养老机构或社区的自身发展潜力，使其能够不依赖于政府扶持和补贴而可持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

应对老龄化，中国需要哪些社会经济政策⁸

赵耀辉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未来还可能成为重大阻碍，该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想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团队撰写“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以下简称《重大报告》）的初衷。

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可能引发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还可能引发养老保险和医疗体系的财政危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其实老龄化本身是一件积极的事，因为只有人的寿命延长，健康状况改善，才可能发生老龄化，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如果我们能提供充足的保障，让老年人有底气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老龄化问题就不存在。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目标：健康老龄化。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并请大家关注健康老龄化？主要因为人只有身体健康才有能力成为一个贡献者，一个生产者，而不仅仅做一个消费者。

健康老龄化不会自然发生，它需要通过一些政策改变才能实现。众所周知，健康的决定性因素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生命历程中的很多因素都值得关注。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医疗服务领域，社会和居家环境的适老化也非常重要。

健康老龄化虽然不能自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它能带来更多的健康生产力。我们可以通

过政策调整来激发健康生产力。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假如把所有为生计进行的活动，比如务农，都算作工作，那么城镇人口的退休年龄比农村人口早很多。居住在城市的人显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比农村早一些离开工作岗位。

我们的研究表明，城镇人口退休时，其健康和认知状态大都处在良好状态。身体健康，人却要硬性地退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曾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城市人拥有相对较好的社会保障，从50岁、60岁开始就能领取养老金。农村虽然也有社保，但数额很少，不足以影响劳动者继续劳动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农村人口因退休金太少，何时退休取决于自己的健康状态，只要还干得动就不会选择退休。

假设退休完全由个人健康状况而定，城镇人口的退休年龄或就业率该是什么情况？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展开了另一项研究，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研究方法，结果发现城镇65岁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其健康状况大都良好，退休主因并非健康不佳。由此可见，退休年龄过早的情况在我国城市普遍存在。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引发的财务危机。这些国家都希望推迟退休年龄，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落实。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仅靠健康老龄化还

8. 本文根据赵耀辉教授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圆桌对话环节的发言整理。



不够，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合理地利用健康劳动力。

该如何做好顶层设计？我们建议：

第一，取消强制退休年龄限制，不要强迫退休。很多女性到 50 岁、男性到 60 岁依然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愿意继续工作，很多人还有深厚的专有人力资本，倘若离开熟悉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或是换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专有人力资本可能就此作废，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退休应该有灵活性，让大家能够自主选择。

第二，消除老年人歧视。针对老年人的歧视在我国并不鲜见，网友们甚至开玩笑“现在连 35 岁以上的人找工作都受歧视，更别提 60 岁”。由此可见，工作场所的年龄歧视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歧视为何发生？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加以改变？我们建议还是要理解歧视发生的深层原因，改变歧视背后的经济因素，从而降低甚至消除歧视。

第三，政府要创造条件，让 50 岁 -60 岁年龄段的人群有底气继续工作。50-60 岁年龄段人

群是照料老年人的主力军，也是照顾孙辈的生力军。如果没有好的社会服务可选，这部分人必须退休回家照顾父母或照看孙辈。在我国，0 到 3 岁儿童照料服务还非常缺失，对老人而言，养老院的服务质量也一言难尽，聘请护工照料老人又价格昂贵，对一般家庭而言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奈之下，50-60 岁年龄段人群不得不选择退休，回归家庭。如果能提供有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免除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我相信他们仍然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第四，帮助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我国正处在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许多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在新技能、新技术使用方面很容易落伍，这时候需要政府和市场提供培训教育的机会，帮助这部分人跟上时代。

虽然我们这份《重大报告》谈的是健康，但其内容已经远远超越健康领域，特别是退休照料领域，很多政策设计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才能高质量完成。

养老机构面临必要的调整⁹

陈欣欣

北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员

我主要想讲政府在养老机构发展壮大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养老机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

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们对养老机构的数量进行了估算。2010年到2019年间，我国城乡养老机构数量出现了大幅波动，其中农村下降了约50%，而城市上涨了119%。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趋势。随着国家加大对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城市养老机构快速扩张，其床位数和机构数分别在2015年和2018年超过了农村。在这一阶段，城市养老机构的床位数比养老机构数增长更快，这意味着养老机构不仅数量在增长，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些养老机构的床位利用得怎么样呢？平均而言，城乡养老机构床位的空置率接近一半。即使农村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在大幅下降，但根据我们的估算，2019年其空置率仍高达47%，且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是否是因为照料需求太少导致高居不下的空置率呢？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农村，约有19%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暂时得不到照料，城市里处于相同情况的老人比例也高达11%。基于上述结果，无论在

农村还是城市，老人未得到满足的照料服务需求量比较大。

一方面老人照料服务存在很大缺口，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床位空置率居高不下，这种失衡的结构背后蕴藏着哪些原因？

近年来，政府大力支持养老机构建设，采取直接补助或贴息的方式，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设施。政府是按照何种标准发放补贴的？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建设阶段，还是运营阶段，都是按照床位的数量进行补贴，如此一来，床位数越多的养老机构，能得到越多的补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后，大型养老机构纷纷上马，机构规模越做越大。由于城市中心区域土地资源比较紧张，大规模的养老机构多数建在城郊，无法缓解城市中心区域“一床难求”问题，导致养老机构区域分布的失衡，造成养老资源的巨大浪费。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照料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等特别基本的生活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照料需求要求在养老院既能享受到生活照料、也能享受到精神慰藉，以及包括疾病治疗、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在内的医疗服务，但当前多数养老院难以满足医养结合的照料需求。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二元现象：一方面城市中心区域的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因为价格便宜，

9. 本文根据陈欣欣研究员2022年11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提供的照料服务显得物美价廉；另一方面非中心区域的民营养老院价格昂贵，提供的照料服务却良莠不齐，尽管床位不少，但空置率很高，资源浪费严重。

养老机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在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优化养老服务的补贴方式，从当前的补供方（补床位）变为补需方，把补贴真正给到需要照料服务的人手中，由需方自己决定把钱用于何处。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需方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照料服务机构，在促进市场充分竞争的同时，有效提高养老机构的经营效率。

根据我们的研究，农村老人收入相对较低，总体健康状况更差，照料需求更为迫切。倘若政府把补贴给到农村老人手中，部分老人也可以使用养老券到城镇消费，甚至到子女的居住地消费，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选择适合自己的照料服务，同时也有助于破解家庭照料难题。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打破养老政策的户口限制，形成全国统一的照料给付政策。

第二，下大力气推进医养结合真正落地。对于养老院，很多老人的想法是既想住，又不想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养老院无法满足老人们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医养结合政策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从实践层面看，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很常见，但必须达到卫生部门规定的一系列标准。由于受制度所限，无法敞开大门对外提供服务。长此以往，其高昂的运营和人力成本会让养老机构不堪重负。

从理论上来看，医疗机构内设养老机构或许也是一种可行模式，但目前有条件开设养老机构的医疗机构，其本身的医疗资源已经非常紧张，

增开养老机构只会成为额外的负担，对解决目前看病难的问题没有帮助，因此大型公办医疗机构在内部开设养老机构的积极性不高。

另一种医养结合的模式是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签约，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在当前医疗任务量非常饱满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也很难有积极性去开展实质性的合作，通常是养老机构非常热心，医疗机构不积极。

总体来看，目前医养结合的困境主要是医疗服务供给受限，单凭养老机构一己之力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放宽医疗服务的准入门槛，让更多医疗机构加入进来，为养老院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从增量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存量医疗资源，建议通过激励机制改革，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医养结合的积极性，探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高效合作的模式，是今后工作的发力点。

第三，进一步降低养老机构的准入门槛。从2013年开始，针对养老机构的准入政策逐渐放宽，原先需要设立许可，现在只需要登记备案。看似监管措施减少，申请流程简化，但监管并未实质性放松，其中门槛最高的是消防强制措施。

消防达标是一项强制性要求，养老机构想要取得资质，至少要提供建筑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共十余项文件。新建养老机构完全可以参照这些标准来规范建设，但是如果是在农村或城镇老小区的已有建筑中开办养老机构，要求“出具该建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消防设计图纸或消防竣工图纸”，在现实中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强制性的消防安全要求直接将很多社会资本开办的养老机构变为非法经营，把更多愿意投资养老的机构挡在了门外，已成为该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们建议地方政府能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更具体的政策实施细则，同时引入保险制度切实帮助养老机构降低安全风险早日“达标”。

尊重常识是战胜经济挑战的前提¹⁰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我的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与大家交流几个问题。我主要分享三点：第一，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不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危害极大；第三，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国富论》。其实，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叫法，亚当·斯密应该是哲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本哲学著作。他为什么要写《国富论》这本书？为什么要提出“市场”这个概念？这和启蒙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

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太一样，苏格兰人特别注重情感和经验，而欧洲大陆的人更注重理性。这一区别奠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色，也奠定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苏

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人类所做贡献的突出特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至少在当时，是终结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此后，虽然基督教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革新，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已经瓦解。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位奠基人物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对于“道德从哪里来”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督教思想认为道德来自上帝，比如，一个人只要按照“摩西十诫”去做即可。然而哈奇森提出质疑，他认为道德不来自于上帝，而就在每个人心中，人从自己心中就可以产生道德。这是不得了的思想，因为这相当于说人可以不需要上帝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事。这一思想打开了思想启蒙的大门。随后，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向着回归或解放“人性”的方向推进。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他认为情感才是人类行事的基础，而不是理性。

顺此逻辑，下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如果人都回归人性，人行动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那

10. 本文根据姚洋教授2022年11月24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0期“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上的演讲整理。



么如果所有的人性都喷涌而出，包括好的、坏的、破坏性的，这个世界怎么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位思想家，休谟的叔叔凯姆斯勋爵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说法：“Man is created to possess（人为占有而生）”。但如果人真的是生来只为占有，人类岂不是要回到“霍布斯丛林”？

亚当·斯密提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市场，人性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释放，继而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人人为我，最终的结果是人人为社会。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从常识出发。我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这是常识，只不过宗教遮蔽了我们的常识。苏格兰启蒙运动倡导回到常识，因此亚当·斯密提出，要在常识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制度，使人的能量得以释放，然后贡献于社会。市场里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让人的能量贡献于整个社会。

因此，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起，大家应该就能明白——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真的、正确的。如果一个经济理论或者一条经济政策不符合常识，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这条政策肯定要失败。这是我在《经济的常识》这本书里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根本性的道理。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贻害极大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想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货币中性理论

货币中性理论是货币主义学派最重要的结论，卢卡斯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完美世界的假设之上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整个经济运行得天衣无缝，在这种情况下，多发货币只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很多人，包括卢卡斯自己可能忘记了，我们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

在一个有摩擦的世界里，我们老百姓的常识

是，货币并非中性，有钱就有更大的权力，有钱就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当然，老百姓也明白，如果货币太多，钱就不值钱，但当自己手中的货币适当增加时，财富值就有所增加。这是老百姓的直觉或常识，我很认同。在我们真实生活的有摩擦的世界中，货币不可能中性。

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看，美国为什么可以超发那么多货币？如果货币完全中性，美国超发货币就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疫情以来超发那么多货币，美联储扩表数倍，尽管美国也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至少远远低于货币超发水平。为什么？因为货币是一种主权。这就是黄海洲与合作者博尔顿（Patrick Bolton）提出的理论——货币主权理论，当你拥有发行货币的主权时，你可以从发行货币中获利。不只美国这样做，日本也在悄悄地这么做。

在中国的现实中，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同时利率较低，而民营企业往往得不到贷款。如果你相信货币是中性的，你就会说，让货币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长的速度即可。比如，按照5.5%的GDP增速来供应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这是货币主义理论一个核心的政策建议。但如果我们这么做，恐怕民营企业都会倒下。

我经常用“养一池鱼”来做比喻。在一个鱼塘里，国有企业相当于其中的大鱼，民营企业相当于小鱼。如果鱼塘主说，经过计算，池塘里投放200斤饲料正好大小鱼都吃好，他就只精确地投放200斤，结果大概率就是这些饲料绝大部分被大鱼吃掉，大量的小鱼饿死。他应该做的是投放250斤到300斤，让大鱼都吃饱以后，小鱼还有饲料吃。

由此看出，货币并非中性。货币中性的后果是什么？宏观模型里不必再有货币这一选项，也就无法解释和预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货币现象，但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它怎么可能去解释金融危机？因此，货币主义者很别扭地提出所谓“真实周期理论”，认

为凡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都归结为罗默所说的“小鬼们”的捣乱而产生的波动和冲击。这完全不合理。没有货币就不能解释周期，更不能解释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伯南克的流动性过剩理论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他因为研究金融危机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我不认为诺奖颁给他是令人信服的。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他都说，金融危机是由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而流动性过剩是东亚国家储蓄太多造成的。他暗指中国储蓄太多，导致消费太少，然后把钱又运回美国，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过剩，最终使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我把他的这种理论比喻为“地主家的儿子理论”，美国好比是地主，中国好比是长工。长工给地主干活，同时节衣缩食攒一些储蓄。地主家的儿子败家，跑到长工家借钱。长工看在地主面子上把钱借给他，结果地主家的儿子不仅把借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把地主家的家产也败光了。地主不怪自己的儿子败家，反而跑到长工家里抱怨：“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把钱借给我儿子？”事实上，地主应该骂自己的儿子败家，而不应该骂长工的好心。伯南克理论的逻辑和地主的想法异曲同工。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版名字叫《美国真相》。他通过这本书指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金融成为整个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之一。美国在金融上随意施策，即便是巨大的金融危机，美国仍然能从中获利，现在又发展得很好。

因此，美国的真相或常识是：很多问题源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可是很多经济学家不从常识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反而找一些“歪理邪说”。

第三个例子：劳动价值论

第三个不符合常识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我们的常识是，要生产就一定要有劳动和资本，以

及其它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没有资本的前期投入就无法生产。然而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和其它要素都不创造价值，如果资本拿了收入就属于剥削。

如果按这个理论去做，其结果一定是抑制资本积累。如果现在还有人提倡劳动价值论，可能就会吓跑中产阶级和有产者。这也是一个不从常识出发而构造的理论，最后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还有很多这样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但当下经济学的悲哀就在于，这样的理论越来越多。很多经济学家变成了“黑板经济学家”，理论只来自黑板上的推演，而不是从实际的常识出发。

希望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少一点，否则祸国殃民。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现实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不符合常识的政策，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

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不符合常识。常识告诉我们，中小企业的风险很高。虽然现实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好的，我们国发院老师一直在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民营企业中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不专注经营，一心只想套利。并且，中小企业本身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失败的风险很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下，存活三年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技术进步速率很高。如果每家企业都是百年老店，这个国家就不大可能快速发展。美国企业流转的速度也非常高，十年前听说的企业现在很多都已经倒闭，比如摩托罗拉，说明美国的技术进步很快。

但中小企业存活率低、倒闭速度快，对大银行是一个极高的风险。对大银行而言，做中小企



业的贷款并不合算，因为大银行每笔贷款的成本极高，而且大银行的客户规模较大，赚大客户的钱相对容易。所以，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是常识。

然而，每次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时，我们就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痛苦过程，2008年之后搞“四万亿”，也是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最后的结果是不少民营企业拿到贷款之后亏损“跑路”，温州因此爆发了一场小型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不科学的防疫政策

第二个例子就要谈谈不科学的防疫政策。最新的“20条”非常好，要求提高防疫的精准性、科学性。如果我们能按此执行，常规化的防疫效果就会推进一大步，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小得多。

我们北大国发院有一个模型，计算出今年因防疫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GDP的3%。这个数字很大，因为我们每年的GDP总量已经超过100万亿，3%就是3万多亿。经济的潜在增速大概在5.5-6%，这3%的损失很可惜，但时间已经走到年底，谁也无能为力。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尽管最新的防疫“20条”非常好，但这一轮疫情起来后，各地仍然在层层加码。我个人认为，原因还是在于不按常识做事。

常识之一：清零一次不等于病毒永远消失。今年来来回回至少有两大轮疫情，春季、冬季各一轮，中间短短的窗口期还有零星暴发。如果我们承认“清零一次不等于永久性消灭病毒”这一

常识，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常态化防疫措施，就应该按照“20条”来精准防疫，而不是每轮疫情到来的时候都搞运动式防疫。

常识之二：清零政策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在运动式防疫过程中，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按下了暂停键，老百姓收入下降，民众自由丧失，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增长，等等。我们要算政治账，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账。以人民为中心应当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和基层忽视了这个常识，对中央政策的内涵在理解上出现严重的偏差。

常识之三：病毒的毒性会降低。我们的防疫措施应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且要有稳步退出机制。按照现在国际上流行病学家的估计，奥密克戎病毒再迭代三代，大约到明年年中就会等同于感冒。我相信WHO到那时会宣布疫情结束。届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完全开放，因为既然相当于普通感冒，就没有理由不开放。这也是常识。

疫情已近三年，病毒的毒性已经降低，会与人类共存，所以我们就应该计划好退出机制，不应永远像现在有些基层和地方政府理解的那样，以病毒的绝对清零为唯一目标。我们不是要在病毒面前躺平，但在清零和躺平之间，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20条”就是很好的政策调整，可惜没有得到地方的有效执行。

为什么大家对于当下的防疫工作不满意？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很多地方没有尊重常识。我们一定要尽快回归常识。

【对话】美联储是否会持续紧缩？ 中美关系如何求同存异？¹¹

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美联储应继续实施紧缩政策，不宜公开提高通胀目标值

黄益平：近一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第一件事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不仅在短期内影响到了金融市场，而且通过经济制裁等措施，在较长时间内对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第二件事是美联储紧缩政策。美联储迅速提高隔夜基金利率后，目前利率已经上行了375个基点，预期12月还会再次加息，幅度可能是50个基点。第三件事是新冠疫情持续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在第二季度，不过近期防疫政策逐渐放开。以上背景之下，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仅在美国有很多对美联储政策的讨论，在中国也有，因为这一政策对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很大影响。有人认为美联储步伐太快，也有人认为其步伐太慢，您觉得美联储在管理通货膨胀方面的措施收效如何？

Robert Rubin：一年半之前，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表示，美国出现高通胀

的风险很大，当时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可能是对的。我这样说并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当时就认为美联储反应过慢，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因为当时美联储反应过慢，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不过，美国这一经济体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快速做出改变，最近几个月，美联储的政策是比较正确的，但我们现在可能仍然要面对较大的通胀压力。

黄益平：美国通胀正在放缓是一个好消息。也因此，有人期待美联储可能会放缓甚至暂停紧缩步伐，看上去您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Robert Rubin：我并不确定，现阶段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太高，我们的客户中有不少美国的大公司，他们仍然认为美国通胀压力很大、劳动力市场紧缺。他们之中大多数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在放缓，但他们仍然掌握定价权。所以我认为，虽然通胀有所缓解，我们也希望这一趋势能够持续，但现在还难以确定后续通胀会以怎样的速度发生变化。

黄益平：您是否认同，美联储应该继续实施紧缩政策，直至通胀回落到目标值？

11. 本文根据两位嘉宾2022年12月10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对话整理。文章来源：金融四十人论坛。



Robert Rubin: 我认为美联储应该继续紧缩。但关于 2% 的通胀目标, 我还无法确定。

黄益平: 这让我想到了在美国进行的另一场辩论, 杰森·弗曼 (Jason Furman) 和萨默斯都在讨论美联储是不是应该提高通胀目标, 将其提高到 2% 以上, 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Robert Rubin: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认为美联储不应该宣布提高通货膨胀目标值, 因为美联储的可信度现在已经出了问题, 如果美联储宣布提高通胀目标值, 它的可信度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联储可以先让通胀率达到 3% 的水平; 如果通胀率到了 3%, 美联储到时可以决定缓慢地将其拉回 2%, 但并不需要公开宣布。现在还不是对通胀目标做出重大改变的时候。我最近也跟杰森·弗曼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的观点是, 不应该公开宣布更改通胀目标值, 美联储可以等到通胀率降到 3% 水平的时候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黄益平: 如果美联储继续收紧, 人们担心美国滞胀风险可能上升, 您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

Robert Rubin: 美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遭遇过滞胀, 但是当时的世界和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 当时的工会很多, 但是现在的工会合同比当时要少很多, 而且当时的合同是包括通胀调整条款的, 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合同了。美国会发生滞胀吗?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在在我看来, 发生滞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潜在风险与溢出效应

黄益平: 您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平衡了预算, 这让我印象深刻。自从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急剧增加, 总债务已经超过了 3 万亿美元,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

Robert Rubin: 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美国 GDP 大约为 22 万亿美元, 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

债务规模大约是 GDP 的 98%, 即在 20 万亿美元左右。3 万亿美元是社会保障信托基金里的资金, 这部分属于政府对政府的债务。

黄益平: 杠杆率这么高, 叠加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影响, 是否会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偿债困难? 您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是否面临潜在风险?

Robert Rubin: 我认为这方面没问题, 债务问题是良性的, 美国仍然可以维持债务可持续性。但我也认为你的观点非常可取, 虽然美国经济现在表现良好, 但我们今后还需努力降低债务对 GDP 的占比, 不过现在的美国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实现这一点。

黄益平: 美联储快速加息的举措可能会对许多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在 2014-2016 年这段时间, 美联储缩表导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金融危机, 原因包括资本外流, 货币贬值等。我在今年初对此非常担心, 但让我吃惊的是, 虽然新兴经济体市场并非完全没出任何问题, 例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 但问题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严重, 反而是发达国家出现了更多的金融问题, 例如英国的养老金问题、瑞银的信贷问题、日本的流动性问题等。您觉得这是发达经济体本身的问题, 还是美联储政策溢出效应的一部分?

Robert Rubin: 溢出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情况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仍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当前遭遇了严重问题。在我看来, 美联储会基于美国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其他地方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利率水平。但我认为, 债权国应该提供各种形式的债务减免或债务援助, 中国、美国、欧洲这样的债权方都应该参与, 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 新兴市场国家的失败对我们有极大的坏处。总之, 我们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状况。

黄益平: 根据您在 1990 年代参与应对拉美金融危机的经验, 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有何建议？如何避免之前发生过的或可能即将发生的冲击？

Robert Rubin：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就 GDP 总量而言，今后或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债权国，自身并不面临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所以中国应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其次，萨默斯和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即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主要还是治理的问题。美国、中国、欧洲这样强大的经济体应该帮助新兴经济体，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无法替这些国家解决问题。中国是这方面的绝佳例子，中国在 1978 年开始改革，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是因为外界的帮助，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努力。另外，新加坡是一个体量较小国家的例子。我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需要提供支持，但是还要设法改善新兴经济体的治理能力，而这很难从外部做到。

黄益平：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金融危机，尽管直接原因确实是美联储加息等举措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过于薄弱，有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高通胀、货币估值过高等问题。我同意您的看法，这些国家需要先处理好自己国内的事情，才能应对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观点很流行：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国内经济基本面还不够强大，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应急于开放资本账户或金融市场。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Robert Rubin：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我对此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思路，我一直觉得资本控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或特定的时期内，控制资本流动也许是有必要的、有道理的。

黄益平：我觉得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包括承受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的能

力。不知您是否记得，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马来西亚重新启动了资本账户控制措施，而印度尼西亚仍然维持资本市场的开放，回顾当时情况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曲线非常相似。所以，究竟哪种解决方案更好，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一切取决于一个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

我们再来谈谈美国的情况，关于美联储加息的后果，您刚才提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问题可能并不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严重，您觉得美国今后是否会出现金融风险？

Robert Rubin：我认为不会出现财政问题，但是债务占 GDP 的比例过高，美国需要控制赤字，把债务占 GDP 的比重降下来。至于金融机构，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也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大型银行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就算会出问题，也是出在那些小型金融机构上，而且也不会导致系统性问题。

中美应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合作

黄益平：中美经济关系方面。您一直以来都主张两国之间更多的交流、对话，我完全支持您的观点。在您看来，现在两国之间还存在深化关系的基础吗？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等部门出台了更多制裁措施，今后两国关系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可能吗？

Robert Rubin：在 21 世纪，中美关系会影响整个世界，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重大问题具有跨国性质，包括核武器化、气候变化等，这是全球性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这些问题。但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于较差水平，我认为两国之间缺乏互信。但如果关系改善，那么收益将会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在贸易规范、投资规范等领域继续合作。

中美双方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等方面肯定会有分歧，每个国家都对价值观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求同存异，寻找可以



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合作，这对每个国家都有极大好处。但是现在两国关系看起来欠佳，彼此互信正在减少，这是有悖于两国自身利益的。

黄益平：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森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中美“功能性脱钩”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大概意思是，两国可以在某些领域脱钩，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合作。我欣赏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应该尽量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但我的担心之处在于，如果美国尝试打压甚至消灭中国的一些高科技新兴产业，同时表示中美应努力在其他问题上合作，那么这种“功能性脱钩”究竟会导向一种新的稳定局面，还是会导向另一种极端情况？

Robert Rubin：我没读过这本书，不过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跨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等，可能会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在另外的一些问题上，我们存在分歧，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分歧并尽量把它们处理好。我们必须努力防止我们的分歧演变成敌对关系，因为这样会影响我们在双方具备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

黄益平：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精确地定义，双方无法在A区合作但可以在B区合作，这样大概是行得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在B区合作，但我要消灭你的A区，这听起来就很难办到。我并不是说这绝对办不到，而是这对政治能力和政策能力的要求会相当高，否则双方是无法应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的。

您应该也在关注美国近来推出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法案，包括《芯片法案》和美国在中美贸易冲突初期提出的措施等，美国方面也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指责，比如批评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工业补贴过多、产业政策不合理、竞争不足等。美国的这些指责，让我感到非常担心和困惑——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所做的保护性补贴需要改善，那为什么美国也在同样的方向上做同样的事？美国究竟是在批评我们还是在效仿我

们？

Robert Rubin：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认为中美两个国家应该为那些存在外部性的产业提供补贴，也就是说，仅靠私营部门的力量发展这些产业，并不能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是应该的。但如果产业补贴不存在外部性，那么补贴就是不应该的。虽然我并非这方面专家，但我知道，在芯片等问题上，部分美国人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需求，美国需要更多地在本土进行芯片制造。

黄益平：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美国中期选举。在前两次的选举中，您都预测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且两次都预测对了。现在美国刚刚进行了新一轮的中期选举，你认为其选举结果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Robert Rubin：这次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很多人否认选举的合法性，其中不乏重要候选人，虽然这些人得到了前任总统的支持，但他们最后输了。现在这些人卷土重来，如果这些人获胜，我认为对美国的民主政体是相当有害的。为了强化美国的民主政体，必须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加以强调。至于中期选举对对华政策的影响，我认为中期选举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我的看法也可能是不完整的。

黄益平：美国上下两院的权力平衡结构变化了，国会的权力结构颠倒了，对吗？

Robert Rubin：对，民主党现在掌握了参议院，但失去了众议院，并且众议院中有相当多持有极端主张的共和党候选人当选。问题是，这些人会倡导什么样的政策？会给领导人施压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只能边走边看。我想，众议院会出现很多复杂情况，因为新上任的众议院领袖会挑战总统，挑战民主党的一些做法，但我不清楚这种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疫情期经济增长特点与成因思考¹²

卢锋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借此机会回顾梳理一下近三年疫情期我国经济增长特点及成因。首先结合数据看看疫情期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几方面特征性表现，然后从疫情及防控政策、宏观与监管政策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因素，并分三个阶段讨论特点成因，最后结合当下形势简略谈一下政策调整必要性。初步看法是，在疫情期困难环境下我国经济仍表现出增长活力与韧性，同时总量增长与总供求两侧不平衡因素积累发酵难以持续，需依据问题导向原则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调整政策加以应对。

疫情期宏观增长整体特点

新冠疫情流行已持续近三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增长态势，一些新兴产业和对外贸易增长强劲，制造业和基建投资较快增长，显示我国经济的较强韧性与内在活力。具体定量观察在宏观层面表现出增长率趋势回落与波动程度增加的特点：近三年经济平均增速不到5%较疫情前三年平均增速显著回落，用标准差衡量的疫情期季度GDP增速波动程度比疫情前增加多倍，2022年经济增速超预期放缓与波动较大。

从国际比较看，疫情前三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6.62%，疫情期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疫情前的0.72，利用IMF相关数据可知全球

疫情期增速与疫情前比较约为0.62，说明我国相关明显表现好于全球平均水平。具体看，这个优势结果主要得益于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收缩幅度较小：当年我国2.3%实际增速虽然是改革时期最低值，相较于全球-3.1%平均增速高出了5个多百分点。这个大比例差距为疫情期我国经济增长较好表现确立了基础。

不过近两年上述比较情形发生转变。如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8.1%，比全球增速6.1%高出33%，不过这个超出比例远低于疫情前三年我国经济增速比全球高出94%幅度。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增长3.0%，按照IMF预测我国全年增长3.2%，首次与全球预测平均增速持平，按照世界银行今年6月预测可能会首次低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可见过去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相对全球水平愈加走弱。

从相对潜在经济增速角度看，GDP增速负缺口角度提示相当规模的经济和福利损失。经济学的经济增速缺口指实际经济增速减去潜在增速之差，负值表示经济不景气，反之亦然。潜在增速大体是指充分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现有要素条件所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但是采用不同方法估计当下或未来潜在增速则可能发生相当差异分歧。就目前我国潜在增速而言，从国内学界近年十余项相关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测结果看，

12. 本文根据卢锋教授2022年11月13日在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2期上的演讲整理。



低位估计认为在 5.5% 左右，高位估测观点认为仍有 7% 甚至 8%，估计结果较多分布在 6% 上下。

一个简单估测思路：考虑我国经济本世纪第二个 10 年进入潜在增速回落“换挡期”，在期初 10% 左右潜在增速基础上假设其后每十年分别以 25%、30% 或 35% 幅度回落，目前应约为 6.0%、6.5% 和 7%。采用上述较低 6% 潜在增速考虑疫情期增速缺口：2021 年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有正缺口，2020 和今年则有负缺口，采用 IMF 秋季对我今年增速预测，估计三年累计负缺口占 GDP 比例可能在 4 个百分点上下，结合同期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对应四万多亿元损失。即便采用 5.5% 上下更低位潜在增速估计，经济损失估计也在 2.5 万亿元上下。

疫情期增长结构特点

给定上述总量增长态势，疫情期增长结构表现出若干组合特征。

一是从总供求关系看表现出供给侧较强与需求端较弱的特点。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首先“供强需弱”特点在代表供给侧的工业生产与需求侧的消费增长比较中明显体现出来。以 2019 年 12 月为 100，截至今年 9 月疫情期工业生产增加值上升到 125.2，消费零售增长到 108.6，代表供给扩张的工业生产增长幅度相当于零售消费约 3 倍。另外“供强需弱”特点在近年一般物价变动和投资增长结构上也有表现。

二是在供给方面第二产业增长较快而第三产业增长乏力的“二强三弱”特点。与经济学配第-克拉克定理阐述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疫情前多年我国第三产业较快增长推动三产占比持续提升，如我国 2010 年三产占比为 44% 低于同年二产占比，此后十年持续上升，2019 年达到 54.3%，年均提升约 1 个百分点。疫情期消费增长受阻导致上述结构转型暂停：2022 年上半年该指标值为

54.2%，与 2019 年比较甚至略有回落；同期二产占比从 2020 年 37.8% 上升到 2022 年上半年 40.2%。由于青年就业集中在服务业，上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动，成为近年青年就业困难的重要推手之一。

三是在总需求内部呈现外需扩张较快与内需增长乏力的“外强内弱”特征。近三年疫情期（截止 2022 年 10 月）我国货物进口大约增长三成，出口增长约五成。2022 年 10 月货物贸易顺差已达 7000 多亿美元，而 2019 年全年为 4200 亿美元，今年顺差可能比 2019 年接近翻番。疫情期我国总需求增长中外需贡献率在 25%-30% 上下。就内需而言，投资增长受到房地产投资萎缩的拖累，消费增长受到疫情冲击的制约，相对外需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新冠疫情及病毒变异株大流行无疑是形成上述增长特征的最重要背景条件，然而类似疫情环境下各国经济表现与遭遇困难存在很多差异，显示各国疫情期经济形势特点与国别特征特别是应对政策选择有关。理解我国疫情期经济走势特点，需把新冠疫情与病毒变异及其流行冲击的客观环境因素，与疫情防控政策与宏观调控及行业监管等方面政策选择因素结合起来观察讨论。另外在近三年疫情期不同阶段，上述因素组合内容变化和影响也不相同，需结合具体情况分阶段讨论其特征成因。

2020 年疫情防控与宏调成效显著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得益于全民动员强势抗疫较快全面控制疫情，4 月感染病例清零后疫情处于较为稳定状态。宏观政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实施大规模救助措施，对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随着疫情形势稳定和经济较快复苏，部分宏观刺激工具在年中前后不同程度逐步退出。经济运行上半年深度收缩后下半年强劲反弹，2020

年1季度GDP增速跌落到-6.9%，但是二、三季度止跌回升到3.1%和4.9%，4季度达到6.4%显示当期增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总起来看宏观经济走出一个V型走势。

以“全国七天平均病例超过100例”作为疫情流行状态一个量化指标，2020年初该指标值一度接近5000例显示最初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由于原始新冠肺炎病毒的毒性较大与致病率及重症致死率较高，加上公众对突如其来疫情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初期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过我国举国动员防控疫情努力较快取得成效，3月18日实现新增病例清零，4月底包括湖北和武汉在内的全国范围所有病例清零，成功阻断了国内疫情传播。由于国外大流行引入外部疫情输入压力，此后到年底仍有个别地区疫情散发流行，国内保持动态清零需付出相当努力，不过总体而言2020年2季度以后国内疫情一度相对平稳，没有发生七天平均100病例情况，为二季度开始的经济快速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经济政策方面，以“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与“5万多亿货币释放”为标志，疫情初期实施一系列积极宏观政策。另外有关部门借助基建投资的特殊政策抓手作用，通过加快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及支持发债及信贷融资，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和扩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这些宏观政策和准财政举措对保证最初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并助推经济V型回升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随着疫情流行与宏观形势变化，与新提出的跨周期宏观调节方针相一致，2020年下半年到年底部分宏观刺激政策工具不同程度渐次退出。如广义货币增速从2020年初8.4%左右增长到同年4-5月11%上下，此后开始回落到年底不足10%；“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从2020年初-8.3%快速飙升到2020年5月的40.7%，此后开始波动下降；另外，社融增速、财政赤字12月均值等滞后期较长指标也在年末开始回落。

随宏观经济强劲复苏并考虑多方面情况，下半年和年底有关部门开始谋划启动若干行业新监

管措施，拉开2021年监管风暴序幕。首先是部署新世纪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监管：8月有关部门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债务融资提出“三条红线”量化管制规则，12月对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追加提出“个人房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限”与“各类房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限”的“两道红线”。其次是10月底以后反垄断力度显著加大，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下年主要经济工作任务之一。再次是强化能耗双控监管：年底有关部门对各地区能源双控目标要求提出三级预警量化指标，未达标地区采取紧急措施努力跑步达标，伴随一些地区年底出现多年未见的断闸限电情况。

2021年经济高开低走复杂成因

2021年一季度宏观经济仍延续2020年下半年经济快速复苏势头，部分借助2020年经济深度收缩派生的基数效应，2021年1季度经济增速冲高到18.3%。此后经济增速回落并在下半年显示后续动力不足问题，3、4季度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4.9%和4.0%偏低水平，年末高层指出经济运行面临三重下行压力。回顾2021年国内环境基本情况，上述“高开低走”与“倒V型”经济走势，尤其是下半年经济超预期走弱并再次出现下行压力，显示疫情形势演变冲击与某些经济政策组合因素的复杂影响。

局部疫情散发流行频率上升，疫情防控对经济运行压力客观上显著增加。国外疫情大流行与感染人数上升，使得防控外部输入病例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病毒变异株传播性和流行性上升，导致实现动态清零防控的困难增加；由此提升局部疫情散发流行频率，年初和年中石家庄、黑龙江与南京等地疫情局部流行，出现两次七天平均100病例的较大疫情。随着下半年外部输入传播力加大的德尔塔病毒变异株并在国内流行，采用“以快制快”策略通过扩大密接隔离等管控措施阻断疫情，难免对正常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带来



较多限制和扰动，经济运行承载负担更为明显表现出来。如何平衡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学界和媒体出现不同认识和讨论的讨论和争论。

2021年初确定当年GDP增长6%以上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绝对水平并不低，对实际增速能达到更高水平也未设限，就此而言体现了增长目标设定的稳健和积极性。不过考虑上年经济增速录得2.3%存在较大增速负缺口，给定增长基数效应以及2021年初经济较快复苏情况，上述年度目标显然约束性较低或宽容度较高，客观上为不同行政部门出台各自认为必要但可能掣肘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提供了多年难遇的有利窗口期。在这个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较快退出早先刺激措施后回归常态化，若干行业实施力度较大的新监管政策，由此派生边际收缩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202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仍延续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退出刺激政策与边际紧缩态势。如广义货币增速在上年底近10%基础上继续回落到2021年4月的8.04%，此后几个月徘徊波动维持在8.5%较低水平。“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经历上年大幅波动后到2021年初降为负值，并到年底一直维持负增长。社融总额增速从2020年10月13.5%高位持续下降到2021年3季度末10%以下。财政赤字12月均值从上年末5200多亿元峰值由升转降，到2021年底降到3500亿元上下。这些政策指标走势对经济运行产生边际紧缩作用。不过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态势再次出现，从3季度后期到年底，宏观政策明显向稳增长方向调整。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部门对加强监管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加上2021年实现经济增长预定目标显示约束较小，使得有关部门可能在较少考虑对增长影响效果前提下追加实施新监管措施，多个部门先后推出重头监管措施使得2021成为监管风暴年。虽然这些监管举措有其现实必要性合理性并取得成效，另外单个行业加大监管效果所及对宏观经济影响

通常比较有限，然而由于这次涉及的房地产、平台企业涉及面较广，加上同时在多个部门重手实施监管调控，难免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影响。

首先在房地产领域开发商增加负债“三道红线”与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两道红线”新规实施，加上各地地产调控力度频率上升到创纪录水平，导致很多大型房企陷入股价下跌、债券违约、评级下调困境，伴随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拍地支出、销售面积和价格等指标不同程度收缩。其次大力推进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使得该行业受到震慑收缩业务：如该年涉嫌垄断行为查处力度大幅提升，据官方统计数据该年主要针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罚没金额235.92亿元，是2019和2020年7.7亿元总和的几十倍。再次是以2021年7月高层发布“双减”文件为标志，针对校外培训特别中小学阶段K12校培业引入力度空前监管举措，这个数以千亿元产出规模、从业人员数百万行业很快面临深度转型与生死存亡考验。最后是继续采用能耗双控措施，伴随多地夏季再次面临电力不足和拉闸停电。针对相关问题，决策层提出实现双碳目标要“先破后立”，指导原有能耗双控监管方式向碳排放双控体系转变，及时纠偏措施舒缓了“运动式减碳”监管措施对经济拖累作用。

2022 清零目标制约下宏观稳增长

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破防和流行后，以其更大传播力加剧区域性疫情此起彼伏反弹，动态清零目标实现难度空前上升，对经济运行所造成掣肘和冲击范围、频次与力度也显著增加，如何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关系成为短期突出矛盾所在。在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下行压力间歇性加大环境下，决策层与宏观部门动用各种政策手段，罕见地出台数轮涵盖面广泛的扶持性和刺激性的稳增长政策，上年集合推出的行业监管政策也出现局部性舒缓。这些调控与调整干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未能防止和扭转经济增

长实际水平与年初目标出现较大差距的不利情况。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先发辨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12月9日我国发现首个病例，到1月中旬已有十几个省市发现新变异毒株感染，并在天津、河南出现过百病例区域性聚集。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力传染性数倍于原始病毒株，虽然社会投入防控疫情资源和努力不断增加，仍难以杜绝局部聚集性疫情此起彼伏频繁发生，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越来越困难。截至2022年11月初已经出现七次超过七天平均100病例或更多病例。用“每天平均病例数”、“7天平均100例以上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作为疫情流行相对强度指标，分三阶段讨论疫情相对强度：2020年1月1日-3月30日日均病例数为1148个，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为65.2%；2020年4月1日-2021年11月30日，日均病例数只有28，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仅为3%；到2021年12月-2022年11月初，日均病例数回升到493个，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超过2020年初达到74.2%。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冲击经济的基本机制，是特定城市疫情爆发流行后，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用从宽口径密接筛查到区域静默封禁方法，实施全民日常核酸检测到大规模兴建方舱隔离密接及感染人员的策略，通过以快制快、四应四尽、“圈住封死”、“捞干筛净”等一系列缜密严厉措施加以应对，经过1-2个月或更长时间付出较大代价基本能实现疫情动态清零目标。然而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超强，经过一个较短暂时相对平静期后，疫情可能会在其它城市和地区再次流行，又需再次全社会动员从头来过。这个循环往复过程不仅使得疫情流行城市和地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还会通过物流、生产、消费等渠道对其它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相关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尤其是3-4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疫情流行，由于这些城市在人员流动与物流联系方面具有更大空间范围的辐射效应，更是对宏观经济带来显著

影响。结果是凭借我国特有体制能力加上社会成员支付显著代价，我们仍能在一些疫情流行区实现清零，然而2022年疫情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疫情清零目标实际上已难以实现。

在疫情冲击压力持续存在并趋势性增加环境下，宏调领域罕见出现几波“疫情冲击、经济告急、宏调加力”的拉锯战形势。2021年末决策层提出经济形势面临三重下行压力前后到2022年初，有关部门推出一系列提振经济举措，推动年初经济运行显著好转，2022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升到4.8%。然而3-4月多个一线城市疫情流行与上海等地实施区域静默管控措施制约全国经济增长，2季度增速再次探底降到低于1个百分点。决策层在4月底到5月出台新一轮宏调政策，5月23日国常会推出33条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稳增长措施，随后还召开万人电视会议部署落实，凸显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与高层宏调决心，对防止经济形势出现更为不利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三季度经济再次较快复苏，经济增速回升到3.9%，但是4季度一些地区疫情压力再次显著增加并向经济部门传导，央行等部门在3季度中期以后频繁采取降低各类利率(MLF、存款、贷款中期利率)方式呵护增长态势。另外考虑到2021年若干行业监管风暴已达到的预期成效，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所承受下行压力，2022年部分强监管行业特别是房地产监管政策实施显著趋缓。

经济稳增长政策在对冲疫情流行及防控政策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仍难以阻止经济下行趋势持续加大，给定前3季度经济增速3%并结合观察4季度一些高频数据表现，今年增长速度与目标增速可能出现较大缺口。考虑上述形势，2022年11月10日最高层审批通过并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次日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不同程度放松了原有疫情防控某些管制措施。优化调整疫情政策意味着不同地区可能会先后出现流行增加的困难，然而新的政策思路调整符合疫情流行不同阶段防控方针演变的客观规律，对走出今年经济增长困境和实现明年



及后续经济常态化增长应有釜底抽薪的积极意义。

外部环境演变特点和影响

最后看一下疫情期外部经济环境特点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特征产生影响。疫情期间美西方主要经济体采取远超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由此推动经济正“V”型反弹并进入过热状态，特别是2021年二季度后通胀节节升高，最后发展成为几十年罕见的严重通胀。为了应对通胀美西方国家去年底以来先后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全球汇市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造成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阶段性紧张加剧。另外在疫情和金融市场波动冲击下，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经济承压甚至发生债务危机。

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2020年初签订中美经贸协议后，两国关税争端暂处静默期，然而双边经贸与整体关系博弈因素和矛盾有增无减。拜登主政后在科技、金融、供应链、地缘政治等方面强化竞争立场，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采用“小院高墙”策略扩大限制和制裁，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及俄乌冲突影响，两国经贸和整体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上述外部环境演变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多方面影响。美国和西方经济过热通胀也导致他们对我国商品需求一度飙升，在中美宏观经济“镜像关系”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较快增长，一定程度缓和了疫情期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矛盾，然而这也提示后续随着美西方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减速衰退，我国面临的调整压力会相应上升。疫情期美西方过度需求刺激和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通过进口价格上涨造成我国工业品价格波动与贸易条件不利变化。我国多年来通过一带一路等渠道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中积累了相当数量对外债权，疫情期特别是随着美西方货币紧缩全球流动性收紧环境下，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形势困难对我国也具有相应影响。

伴随中美关系与外部环境演变，近年我国经济发展方针也出现一些调整，如更加重视国内大循环与发展安全目标，要求加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创新能力，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减少我国重要民生商品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等等。不过虽然上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不可忽视，就上述宏观增长总体和结构特点而言，疫情流行演变趋势与疫情防控措施、宏观调控及行业监管等方面国内条件，应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需调整政策尽快走出经济困境

全面观察我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包括强有力应对高致病率高死亡率的最初原始新冠病毒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我国因疫情流行死亡人数较少，我国基建、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供给侧未来能力的物质实力基础，出口强劲增长显示我国在全球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具有特殊优势和竞争力，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井喷式增长凸显我国经济内在活力和韧性。虽然我国经济基本面具有特殊优势，但是直面现实需重视近三年疫情期经济增长形态多重难以持续性，通过调整政策尽快走出困境。

要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资源使用在继续扶持市场主体同时考虑适当接济市场个体，以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另外疫情期宏观调控实践提出如何处理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关系问题。逆周期调节是宏观政策干预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方法，然而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需防范特定政策干预的超调作用，识别应对宏观经济运行阶段转变之际的苗头性问题，因而又需具有跨周期意义上的前瞻性。需总结近年实践，更好厘清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主次关系和优先序，更有效发挥逆周期调控稳增长的功能。

从长期看需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抑制内生增长活力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使得我国潜在产出增长

能力得到充分激活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要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和二十大制定的发展目标,在继续推进分配和公平领域改革同时,加快实施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重大改革措施。在实施新的重大监管政策时引入经济增长和就业效果评估程序,避免推进过急和力度过大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大影响甚至冲击。

适应疫情变化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要成就,然而随着

疫情传染性和致病性强弱组合发生趋势性变化,持久坚持清零方针面临政策可持续性困难。需按照 11 月 10 日高层优化疫情防控重要决策精神,在总结近期落实国务院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经验,进一步有效管控各地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偏颇,适当优化调减现有防控举措的过度管制内容,同时加强对老年等重点人群保护以及医疗资源储备动员,通过一个时期有序调整过渡到疫情防控与其它发展目标更好协调兼容的新常态。



个人养老金业务将加快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¹³

沈绍炜

富国基金首席基金投资分析师，金融学博士

黄卓

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随着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推出，传统银行的零售业务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今年是《资管新规》[1]正式实施的第一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打破“刚性兑付”，未来如何更好为客户进行投资理财做好长期资产管理服务是每家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的关键所在。正如招行行长王良在2022年三季度业绩交流会上提到银行，如果“不做零售业务，现在没饭吃，未来也没饭吃”。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推出，一方面有利于传统银行零售业务的转型，借助商业银行在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先发优势加快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传统银行业也面临着第三方服务同质化的竞争，以及提升投顾团队专业性等诸多挑战。

传统银行零售业务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及数字化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银行业务可以通过线上办理，从而导致了客户的离柜率越来越高。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截止2021年底，传统银行的离柜率从2012年的54.37%提升到了2021年的90.29%[2]，也就是目前基本只有约10%的客户会到银行办理业务，未来大量的银行网点都面

临着网点转型甚至被关闭的风险。

同时，随着《资管新规》正式实施，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打破“刚性兑付”，大量客户的投资理财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财富管理业务是高频业务，可以增加银行和客户之间黏度，重新架起银行和客户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尤其是过去两年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很多客户的投资体验并不好，这个时候更需要银行理财经理等专业的指导和服务。但是，由于传统银行以前的财富管理业务主要以“卖方销售模式”为主，通过频繁交易基金，乃至“赎回买新”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金赚钱，基民亏钱”的困境，未来，如何让投资者有更好的获得感，不仅需要专业的投顾团队支持，还需要健全的服务体系为普通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理财服务，这也是未来传统零售银行转型的发展方向。

个人养老金业务将加快传统银行零售业务的转型

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布，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于11月18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和

13. 本文来源：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及《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目前，首批可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有 23 家商业银行和 11 家理财公司。同时，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3]（简称《实施办法》）规定，参加个人养老金业务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在养老金业务推广的初期，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积极借助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推广加快银行零售业务的转型。

首先，参加人需要到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并且这个账户是唯一性的。虽然《实施办法》规定“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但是，考虑到具体操作流程及时间效率等因素，一般普通投资者很少变更其资金账户。商业银行具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和网点体系，可以通过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加强和客户的联系，做好客户的服务工作，增加客户的黏度等。近期，很多商业银行已经通过各种线上和线下渠道，开展各种“开户有礼”等活动来抢占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的先机，目前各家银行发布的开户有礼活动主要统计如下：

| 银行 | 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有礼活动 |
|-------------------------------|---|
| 工商银行 | 开户有机会得50元微信立减金 |
| 农业银行 | 开户得50元微信立减金 |
| 中国银行 | 预计本周五（12月2日）上线 |
| 建设银行 | 开户得50元微信立减金 |
| 交通银行 | 开户得58元贴金券；办理实体社保卡，再得50元；邀朋友开户，最多得280元 |
| 邮储银行 | 开户抽奖，最多拿500元红包 |
| 招商银行 | 开户抽奖，最高得288元红包；存入10元，再领10元红包 |
| 广发银行 | 开户得50元福利金；存入1000元以上，再获150元 |
| 中信银行 | 开户领20元微信立减金；存入1000元，再领18元；存入12000元，领68元 |
| 民生银行 | 开户领30元立减金 |
| 兴业银行 | 开户领18.8元-288元红包 |
| 平安银行 | 开户立领25元红包 |
| 北京银行 | 开户后领30元-288元红包 |
| 浙商银行 | 开户后抽奖，送14888-50000个积分；存入100元以上，再送积分； |
| 宁波银行 | 开户成功并存入满100元，奖励6600波豆；3人成团，再送3300波豆； |
| 截止时间：11月28日；资料来源：各家银行手机银行APP等 | |

其次，在证监会发布的 37 家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中 [4]，其中有 16 家商业银行入选，包括 6 家国有大型商业大行、8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两家城商行。目前，仅有商业银行具备各类金融养老产品的代销资质。在美国市场，根据 ICI（The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的数据表明，截止 2020 年底，美国

IRAs 主要投资在共同基金、银行存款及保险产品等金融产品。在中国，虽然我们的个人养老金业务才刚刚起步，但是根据《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1）》表明，目前投资者参与养老金融投资主要选择银行存款、商业养老保险、银行理财和基金等金融产品。在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中，相比其他销售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和



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商业银行具备所有养老金融产品的销售资质，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投资各种金融养老产品提供了更好的便利性。

最后，在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推广初期，商业银行还有大量的对公客户资源，可以实现批量开户做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拓展。个人养老金制度给予了税收优惠制度，因此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吸引力更大。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假设分析，2018年个税改革后，我国个税缴纳群体为6500万，考虑到近些年的工资增长等因素，预计目前缴纳个税的群体为8000万左右，同时，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的上限为12000元，投资者可以按月、分次或按照年度缴纳。这样的制度设计，对有缴纳个税的工薪阶层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而且需要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些缴纳个税的客户主要是银行的对公客户代发工资户等。《实施办法》中也规定，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可以本人办理也可以委托在职单位批量办理。传统商业银行具有大量的企事业单位代发工资户，这些客户天然就是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潜在投资者，商业银行可以利用银行内部的“公私联动”批量拓展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同时为这些客户提供长期的财富管理服务。

传统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金业务面临的挑战

传统商业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金业务占据了诸多先发优势，比如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养老金融产品线及优质的“公私联动”客户资源等，但是，传统商业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金业务也面临着如下挑战：

首先，各家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程度较高，从目前各家银行推广的各种个人养老金业务推广对比分析，主要还是侧重于对投资者进行养老金业务的教育宣传，各家银行主要通过预约开户或开户抽红包等活动，来抢占个人养老金

资金户的市场份额。除此以外，对未来个人养老金如何进行长期投资，如何帮助不同的客户做好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服务，及如何由过去的“卖方销售模式”转为“投顾服务模式”的财富管理业务，都是银行未来零售业务转型面临的痛点和挑战。

其次，如何做好普通投资者的养老金融教育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也将决定未来个人养老金业务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尤其对银行的客户而言，养老金融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方面，银行的客户风险偏好较低，虽然《资管新规》开始正式实施了，目前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已经高达95.09%^[5]，但是，大部分银行客户仍然对银行理财产品持有“刚性兑付”的预期，今年两次理财产品的大幅破净，尤其是近期11月份债券市场的大幅波动，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又加上在自媒体时代被放大和迅速传播，大量银行的理财客户赎回产品反向加强了市场波动，比如根据外汇交易中心iData数据库，在11月14日-18日这一周，基金净卖出现券3014亿，创19年以来最大单周净卖出，理财产品净卖出现券1072亿，同样是19年以来最大的单周净卖出，比2020年永煤事件以及今年3月“固收+”引发的卖出规模都要更大。很多客户仍然无法接受短期市场的波动及打破“刚性兑付”，从而引起大量赎回理财产品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1）》表明，很多投资者认为，养老金金融产品的收益偏低是目前养老投资最大的问题，而如果要提升养老投资产品的收益率，投资组合就需要增加比如公募基金等养老金融产品同时投资者需要承担更大的市场波动，如何通过养老金融教育让客户长期持有熨平短期的市场波动，让更多投资者能够理解和践行长期投资的逻辑和理念也是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金业务过程中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目标。

最后，如何协调银行内部资源，打造个人养老金投资服务品牌也是传统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

金业务面临着一大挑战。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推出给了传统银行零售业务转型带了新的机遇，但是这项业务涉及到银行内部多个部门，不仅包括传统的零售条线暨个人金融业务，也包含公司或机构部门等，而且还包含了对外品牌宣传等相关部门。同时，个人养老金业务拓展初期对银行的边

际贡献其实并不大，因为每个客户每年最多投资12000元，还需要长期投资服务，如何协调银行内部资源，统一打造对外个人养老金品牌，同时培养建立起更专业的投顾团队和服务体系，也关系着未来传统银行能否在个人养老金业务保持优势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资管新规》暨由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等四部委在2018年4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简称《资管新规》，全文详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23101.htm

[2]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2021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原文链接：<https://www.china-cba.net/Index/show/catid/14/id/40628.html>

[3] 2022年11月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4]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截至2022年11月18日）》，信息来源：<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00/c6550572/content.shtml>

[5]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研报，<https://mp.weixin.qq.com/s/eE3NVDNPvjd2RoXj1T0eF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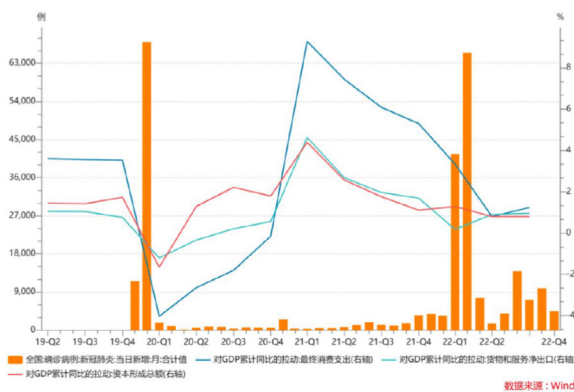
疫情下的消费与资产价格变动特征¹⁴

赵波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疫情以来，我国总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2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 2021 年有显著下降。就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来说，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

从 2019 年一季度到 2022 年四季度，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历了两波高峰：一波是早期的德尔塔病毒，一波是最近的奥密克戎病毒。图中蓝线代表消费支出；红线代表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浅蓝色线代表进出口。这三条线分别代表着需求的三驾马车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



消费波动显著大于收入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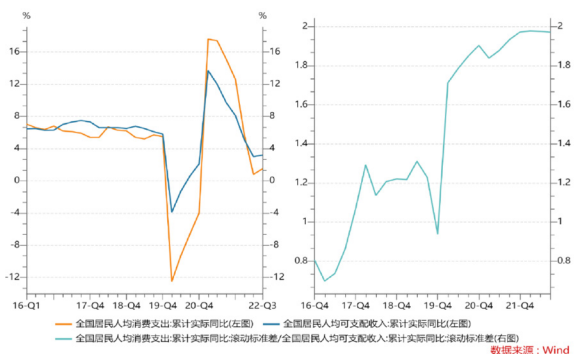
三条线当中，波动最大的是最终消费支出。

为什么消费这么重要？除了消费下降是导致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之外，还因为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福利的优化，而社会福利很重要的度量就是居民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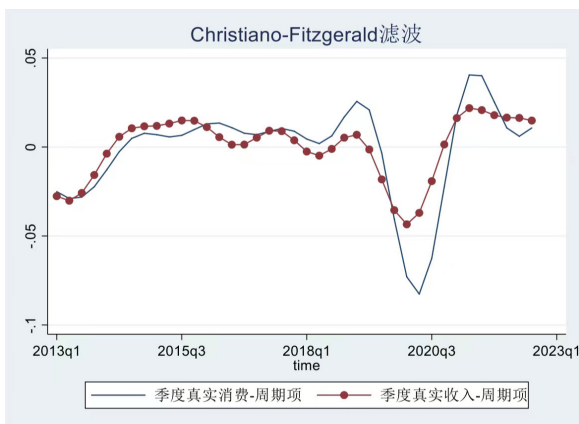
居民消费收入比指的是消费除以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整个疫情期间，中国居民城乡平均消费除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不断变动。在疫情之前，这个比值大约为 67.5%，即每 100 块钱，老百姓平均花出去 67.5 元。第一波德尔塔病毒席卷中国时，消费收入比有明显下降。消费收入比越低，居民储蓄率就上升。在第一波德尔塔病毒到来之后，短时间内居民储蓄率上升大约 5 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好转，消费收入比不断上升，储蓄率有所回升。但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的流行，消费收入比“二次探底”，这也伴随着储蓄率再次轻微上升。

储蓄率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意味着消费波动率的上升。下图呈现了疫情期间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变化。在疫情期间，消费下降幅度要明显高于收入的下降幅度。而在疫情好转期间，消费的反弹幅度又要显著高于收入的反弹幅度。

14. 本文根据赵波副教授2022年11月13日在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2期上的演讲整理。



通过构建季度居民真实消费和收入，并剔除趋势之后显示类似结论，对比 2020 第一季度前后数据，居民收入的风险上升 67%（CF 滤波，对数真实收入标准差从 0.0144 上升到 0.024），消费的风险上升了 181%（CF 滤波，对数真实消费标准差从 0.0162 上升到 0.045）。



消费波动率增大的成因

究竟是什么造成消费波动率大幅上升？可能有四种解释：

第一，和居民收入的风险有关。由于就业、经营活动受限，居民收入在疫情期间出现大幅度变化，从而导致消费变化，这是传统的传导机制在起作用。

第二，和疫情防控政策有关。疫情防控在此期间限制了某类消费场景，造成居民消费大幅度

变化。

第三，对于未来的预期改变。消费是长期的规划，如果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上升，就会影响到当前的消费决策。

第四，资产价格的变化。资产价格本身会带来财富效应，从而改变居民的消费。与此同时，通过家庭的投资选择，消费也会通过需求端的改变来反作用于资产价格。

关于第一种解释

首先来看收入变化，如果把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为四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在第一波疫情德尔塔病毒到来时，发生最大下降幅度的是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多的人群是自我雇佣者、中小微企业主，其收入主要来自于经营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再次是财产性收入。第二波奥密克戎病毒来临时，下降幅度最大的仍是经营性收入，其次是财产性收入，这段时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下降超过工资性收入的下降。

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对于每一单位的收入变化，消费者的边际调整小于 1。如果我们认为收入下降是唯一造成消费下降的原因，那么现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消费的波动性要显著高于收入的波动性。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从其他角度去探究的原因。

关于第二种解释

居民消费形式分为三种，分别是线上实物商品消费、线上服务品消费、线下消费。我们发现：线上实物消费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时有轻微下降，但波动性相对最小。受到疫情剧烈影响的是线上服务消费和线下消费。不难想象，一旦发生了疫情，局部封锁、人员静默等举措都会导致消费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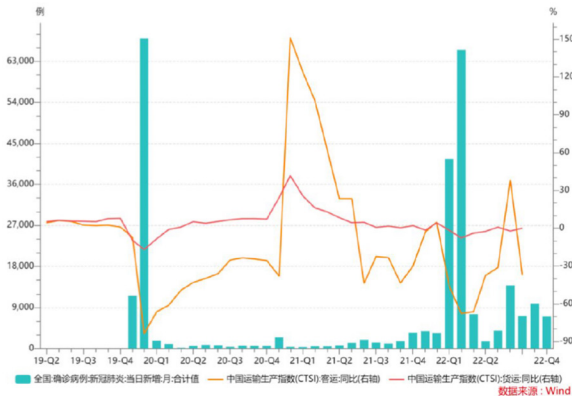
通过消费的分类也可以验证这一点。如果把消费按照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



交通、通讯、教育文化来划分，我们发现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其次是交通和通信，因为疫情增加了人们流动的成本。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奥密克戎这波疫情期间，食品烟酒的消费反而波动比较大，这是跟前面一波疫情不同。可能的原因是餐饮业在第二波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更大。

从要素流动来看，疫情对客运和货运的影响不一样。下图是疫情期间中国的运输生产指数，橙色代表客运量，红色代表货运量。货运量在第一波疫情时有明显下降，但第二波疫情中影响却偏小，这与保生产和物流的政策有关。相比而言，客运量在第二波疫情中下降幅度同样非常大。限制外来人员流动的居家隔离、赋码、弹窗等政策极大的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出行和流动。



今年5月份，北大国发院课题组专门对相关数据做过估算，以此来测量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当时，我们把疫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散发疫情，指五天内新增病例少于10例，属于相对破坏性较小的疫情；一类是爆发式疫情，指新增病例多于10例的情况。

研究分析后发现：散发疫情对线下人流量的影响大概为3.6%左右，爆发式疫情对线下人流量的影响却达到25%。就疫情对整体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影响而言，爆发式疫情将会是散发式疫情的10倍左右，因为前者会伴随着更加严格的封

控政策，所以当地消费会进一步下降。

关于第三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强调消费者信心变化的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和乐观程度。在第一波疫情时，消费者信心大约下降10%左右。但最让人吃惊的是，最近这一波疫情使得消费者信心下降近三分之一，几乎是断崖式下降。所以，在这波疫情中，消费者对于未来特别悲观。

根据央行对所有代表性城镇储户的抽样问卷调查显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未来收入的信心再次下跌到2020年新冠首次爆发的水平。第一波新冠病毒传播期，大约有28%的人表示收入相对于以前下降。这一波，人们感受的收入下降概率再上升到了22%。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消费者就不敢去消费，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预防性的储蓄。这种情况下，政策对于消费的刺激也会很有限。

关于第四种解释

第四点是消费风险和资产价格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第一、消费风险传导至资产价格。影响资产价格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利率水平。不同期限结构的利率水平称为收益率曲线，对应着不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通常期限越长，收益率越高。疫情期间债券利率，特别是短期债券利率不断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疫情带来消费者的消费和收入风险不断上升，私人部门有避险的动机，对于无风险资产的偏好会加强，包括国债在内的低风险资产受到青睐。大家对于资产的需求上升会抬高债券的压力，从而压低利率水平，导致市场上利率持续降低。所以这与人们的资产选择有关。

第二、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消费。可以观察消费与不同资产收益率的关系。疫情期间沪深300的收益率和居民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

是传统资产的财富效应，当股票价格下跌时，叠加疫情的不确定性，它可能会造成居民财富大幅度缩水，进而使得居民消费显著下降。

另一个原因是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消费风险对于资产价格的传导），当消费波动性增加，居民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就会增加，这时候如果股票的收益率和消费增长率保持高度正向关系，居民就不希望持有这种资产，因为这会加剧消费的波动性。居民会增持无风险资产或低风险债券资产，减持股票，进一步打压当前股票的价格。

另外一种对中国居民非常重要的资产就是房地产。伴随着房地产的调控，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房价的增长率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房地产财富的下降对于居民消费的存在着一定的压制作用。从消费波动传导到房价的作用要比对于股票的影响小的多。

放眼长期，未来如何？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如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减去三个月国债收益率，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预测效果。收益率曲线斜率的差值越大，意味着未来消费或者

投资的需求增长会更快，经济越可能复苏。我国目前的收益率曲线预示着我国在中长期存在消费反弹的巨大潜力。

小结

以上基本数据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中国居民的消费波动性显著大幅度增加。我们通常关心消费的绝对增速，因为这和经济增速呈正相关。但我在报告里想强调一点，消费的波动性和消费的增速一样重要，消费波动率过大时同样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消费风险的增加往往使居民对于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股票和房价等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

政策建议：应该避免防疫政策过度，特别是地方政府、街道、社区的层层加码，真正落实《二十条》的防控精神。当务之急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稳消费，减少疫情防控对于消费的压制作用，这也将有助于明年、后年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的逐步稳定。



1.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多项法律的修改和出台以及人事任免事宜。会议闭幕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一期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作了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的讲座。

2.2022年12月2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2022年增聘学部委员名单》发布，正式确定医学卫生健康及相关领域“真学问，真能咨询，品格得到认同”的70名杰出专家新任学部委员。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当选为特邀学部委员。

3.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CER)联合举办CCER-NCER第二届中国经济研讨会。本届会议共设两大主会场、七个分会场，国内外高校一百余名学者在线参加会议，会议收到投稿232篇，入选论文46篇。

4.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第七届

国家发展论坛隆重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由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位知名学者，以及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等优秀学者团队和来自政商学界的代表参会分享。全天主论坛含开幕式、特邀演讲与对话、报告发布、“中国新征程”主题对话、专题论坛暨第63次经济观察报告会、闭幕演讲与对话等精彩环节。下午有五场内容丰富的分论坛与主论坛同步举行，分别聚焦南南合作与发展、企业管理、绿色金融、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数字中国。其中，绿色金融分论坛系首次举办。受疫情影响，本届论坛也是七年来首次全程在线举办。

5.2022年11月21日，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上，北大国发院校友沈可当选2022年中国唯一TWAS青年通讯院士(Young Affiliates)。2007年至今，中国大陆共有16名学者当选，沈可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领域(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第二位当选的青年通讯院士。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